

共產黨百年真相

兩屆政治局常委 親人遭迫害 内幕



■ 作者：林輝

共產黨一百多年的歷史，給人類和中國帶來了什麼？身居高位的中共中央近兩屆政治局常委中，不少人都切身的體驗，他們自身或至親之人也曾遭受共產黨的殘酷迫害。本篇講述習近平、胡錦濤、溫家寶、王岐山、朱鎔基、李克強、俞正聲本人或其父輩們難逃的經歷。

習仲勛蒙冤16載 與習近平被審查

1962年，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等人被指責為小說《劉志丹》的幕後策劃者，成為毛澤東「揪出」的又一大「反黨集團」。

「習仲勛反黨集團」後來被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由此株連了曾在西北工作過的各類官員多達6萬人，連死去的劉志丹也未能倖免，被打成「叛徒」。

文革爆發後，習仲勛受到殘酷迫害，並屢次被批鬥。1968年，習仲勛被接回北京衛戍區「監護」。

林彪死後，中共政治環境略有寬鬆，習仲勛夫人齊心探視習仲勛的請求被批准。當一家人久別重逢時，習仲勛看到習近平的弟弟習遠平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是近平還是遠平？」聽到這樣的問話，「大家都哭了，父親的淚水也奪眶而出。」

1975年5月，習仲勛被解除「監護」。文革結束後，習仲勛先後出任廣東省委書記、人大副委員長等。

無疑，習仲勛的命運也決定著其家人的命運。習仲勛被打倒時，習近平才9歲，他開始時處處受到歧視。15歲時，因受父親問題的牽連，被有關部門多次關押審查，出來時，身體非常虛弱，全身都是虱子。1969年1月，未滿16歲的習近平到陝北延川縣梁家河生產大

隊插隊，一去就是近7年，受了不少的罪。其後，隨著父親的被「平反」，習近平的命運也發生了改變。

胡錦濤之父冤死

胡錦濤的父親叫胡靜之，經營一家祖上留下的茶葉店。1945至1946年間，胡靜之將「胡源茶葉店」開到了江蘇泰州當時最熱鬧的彩衣街上，生意很興旺。

胡錦濤是胡靜之的長子，下邊還有兩個妹妹。1949年，胡錦濤7歲時，母親過世，胡靜之一直沒有再娶，而是將三個孩子送到妻子的舅母處撫養成人。胡錦濤18歲那年考入北京清華大學。

就在胡錦濤十幾歲時，中共為了解決財政上的危機以及鞏固專制統治，將私人企業收歸國有。胡靜之的茶葉店當然也難逃厄運，其本人也成為了泰縣供銷社的一名職工。

後來在文革期間，胡靜之得罪了當地的一些人，於是被造反派誣陷其貪污公款，被拉到台上進行批鬥，甚至還被關了起來。據說，胡靜之被關押的時候慘遭迫害，身體一天天垮了下去。在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只有50多歲的胡靜之含恨離開了人世。

當時年約36歲的胡錦濤正在青海任職，已經是副處級幹部。當他聽聞父親去世的消息後，遂攜全家回來奔喪。在安葬父親前，胡錦濤找到當時的泰縣縣長陸某及供銷社領導，請求為亡父平反，並開一紙證明。

為了達成這個心願，胡在當時泰縣最高檔的飯店泰縣飯店擺了兩桌酒席請領導們過去「喝喝酒、談談心」，但卻遭到了冷遇，胡只好返回青海。從此，泰州成為胡錦濤的傷心之地，他一直對自己的出生地避而不談，26年來也再沒有回過故鄉。

溫家寶叔祖被關押

溫家寶是胡錦濤時期的總理。他出生於教師世家，祖父溫瀛士生於1895年，曾在宜興埠一所私立學校任校長，其弟溫瀛階，也就是溫家寶的叔祖，是天津一所公立學校的校長。溫家寶的父母也都是執教多年的老教師，父親溫剛是天津第三十三中學的地理老師，母親楊秀蘭是天津市區一所小學的語文教師。

而溫家寶的另一位叔祖，亦即溫瀛士的幼弟溫朋久則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成為一名外交官，是中共首任駐日內瓦的總領事。文革期間，在北京地質學院讀書的溫家寶被分配到甘肅酒泉，一幹就是十多年，直到他1982年奉調入京，而溫朋久夫婦則被投入了監獄，慘遭迫害，直到文革結束。

朱鎔基被下放

曾任總理的朱鎔基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1958年4月，在國家計委工作的朱鎔基被打成「右派」，並由國家計委黨組報請中央國家機關委員會開除黨籍。從此，右派的帽子，朱鎔基一戴就是20年。

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朱鎔基被上調到國家計委機關國民經濟綜合局工作。尚屬「內控人物」的他，沒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職務。

文革期間，朱鎔基再次被下放至五七幹校。從1970到1975年的五年間，他所做的無非是養豬放羊、除草收割，直至1975年鄧小平再次復出。此後，朱鎔基回到北京，被安排至石油工業部管道局下屬電力通訊工程公司任辦公室副主任，副科級。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之後，朱鎔基上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室主任。是年9月，朱鎔基終於

徹底去掉了他20年的政治冤屈。

1998年，在出任國務院總理的新聞發布會上，當一位美國記者問起那段「右派」歲月時，一向敢言和暢言的朱鎔基表情深沉。他說：「這一段經歷對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這件事情。」

李克強父親被打成「老虎」

李克強的父親李奉三原名李敬德，自幼聰穎過人，深得家人喜歡，被教私塾的爺爺視為珍寶、施以悉心教導。他不僅四書功底很好，而且寫得一手好字。

1929年李奉三加入中共後，吃盡了苦頭。1953年中共針對全國幹部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李奉三遭到審查並被關押，還被打成了「老虎」。「老虎」是「三反」運動中對審查對象的稱謂。據舊友回憶，李奉三為人直率，「三反」時，領導說了一些不是事實的事，李奉三十分生氣，就拿起凳子打縣委書記，因此被關押，後來在朋友的幫助下才被釋放。

文革爆發後，李奉三預感到運動的可怕後果，「文化大革命這樣下去，真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他於是攜帶李克強從省城回老家避禍。

俞正聲母親入獄 妹妹自殺

中共政協現任主席俞正聲的父親俞啟威，後改名為黃敬，曾任天津市市長、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副主任兼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1958年因精神分裂導致摔傷，後由於醫療事故去世。黃敬的早逝使他躲過文革一劫，但其夫人范瑾卻在文革慘遭迫害。范瑾出身書香世家，其舅公是大學

者范文瀾。范瑾是文革前中國少數幾位身居要職的女性之一，任北京市副市長、《北京日報》社長。

文革1966年爆發後，范瑾被捕，並一直被關在秦城監獄單人牢房，1975年出獄時已失去言語能力，很長時間才得以恢復。而俞正聲的妹妹，文革開始時是一個高中生，受母親牽連在學校裡被批鬥，後來得了精神分裂症而自殺。據俞正聲透露，俞氏家族文革中有6、7人被害死。

王岐山父親的病根

王岐山是現任中紀委書記。大陸《南方週末》曾刊登文章《我所知道的王岐山早年經歷》。作者以王岐山兒時同伴的身分講述了王岐山的家庭背景和少年成長經歷。根據文章講述，王岐山的父親給人感覺性格內向、甚少言語。其實王岐山父親的性格是因為一段挫折經歷使然。

王岐山的父親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從事土木工程建築；日本侵華後，因為有抗日情結，曾經被國民黨封為上尉官銜，並領取俸祿，而這種下了他在1950年開始的運動中被捲入、被抄家的禍根。受到驚嚇的王父從此謹言慎行，因此在反右派、反右傾運動中免遭整肅。

文革爆發後，王岐山父親一度領取過國民黨上尉俸祿的這樁陳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來。他除了挨批鬥，還被勒令打掃單位衛生。而這樣的經歷無法不在王岐山的成長過程中打上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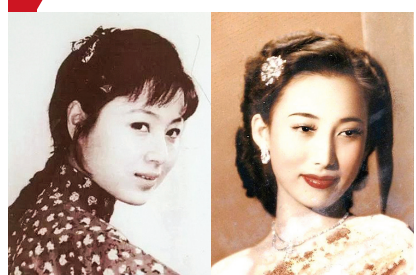
無疑，中共上述在任、卸任政治局常委們都曾領略過紅色政權的殘酷，但他們是否靜下心來想過這一切悲劇的根源來自哪裡呢？

為了悲劇的不再重演，為了下一代不再擁有他們曾經的恐懼，面對著人民一次次的呼喚，該怎樣選擇一條讓中國人民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已是擺在他們面前的選題。◇

焦點

【特稿】共產主義不是出路而是絕路

»P2-P3



文革中自殺的十大名媛

»P4



國學大師陳寅恪之死

»P5



「乒壇三傑」文革自殺悲劇

»P6



北大才子王實味和他滴血的野百合

»P7



中共的殺人歷史

»P10

共產絕路

一百多年的歷史顯示，共產紅潮所到之處，伴隨著戰亂、饑荒、屠殺和恐怖。共產運動重創了人類幾千年的文明，造成了1億人的非正常死亡，更多人遭受肉體與精神的苦難。

【大紀元編輯部特稿】

共產主義不是出路而是絕路

1 共產主義的產生

一百多年前，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上空出現。從《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巴黎公社的出現，到蘇聯、中共等共產黨政權的建立，共產主義思潮曾氾濫一時。人類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了共產極權制與民主自由制兩大絕然對立的陣營。

一百多年的歷史顯示，共產紅潮所到之處，伴隨著戰亂、饑荒、屠殺和恐怖。共產運動重創了人類幾千年的文明，造成了1億人的非正常死亡，更多人遭受肉體與精神的苦難。「人間天堂」的假說，將十幾億人帶入了「人間地獄」。其對信仰的迫害、對道德價值的摧毀、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造成了惡劣而深遠的影響。

在共產主義逐漸瓦解的今天，仍有不少人對此種學說抱有幻想，甚至有人抵制它的消亡，共產主義思潮在自由社會中仍以不同方式出現。因此，辨識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杜絕共產思潮之禍害，對所有國家和個人都至關重要。

共產主義的出現和傳播與人類社會的兩個重大變化有關。其一是工業革命。在工業化國家裡，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每次都造成大量工人失業、通貨膨脹、企業和銀行破產，社會貧富分化嚴重，社會的矛盾也在不斷激化。人們在苦悶徬徨中掙扎，對現實感到失望，從而進行反思，而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與機制還無法提供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在這種背景下，社會主義思潮漸漸興起。它把矛盾根源歸咎於私有制，認為僱傭關係是赤裸裸的剝削關係，而社會主義的一個目標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消滅「階級差異」。馬克思和恩格斯斷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只能日益尖銳，資產階級必然滅亡，因此提出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

第二個相關事件是1859年《物種起源》的發表。進化論假說，推動人背離對神的信仰。共產黨把「物競天擇」的理論帶入階級鬥爭之中，使「鬥爭」成為共產黨維持政權的手段和動力。在追求經濟平等的驅動力下，共產主義所描繪的烏托邦幻景迷惑了不少追隨者。

共產主義運動起源於19世紀西歐的工人運動，以卡爾·馬克思所



▲ 上個世紀50年代中共「鎮反」運動現場。(資料圖片)

著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為理論基礎。自從1917年蘇俄共產黨誕生後，共產黨政權在多國相繼建立，它們發動暴力革命，在各地製造了

連續不斷的衝突和動盪，並且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範圍的社會秩序。追求美好本是人天之性，無可厚非，尋求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亦屬

正常；但是，共產主義宣揚無神論，宣揚階級鬥爭、仇恨與暴力，摧毀人們幾千年來的信仰、文化與傳統，則將人類引向了一條災難之路。

2 共產主義的背後

《共產黨宣言》開篇寫道：「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共產主義並非光明的學說，它起源於黑幫組織，實質信奉魔教。它背後是魔鬼的化身。

據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著名歷史學家詹姆斯·畢靈頓等學者的系統研究，共產黨起源於18世紀德國巴伐利亞的光照幫(Bavarian Order of the Illuminati)，光照幫幫主亞當·魏薩普(Adam Weishaupt, 1748—1830)是個魔教信徒，信奉撒旦路西法(Lucifer)。「正義者同盟」，便是光照幫滲透和控制的一個外圍組織。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一次大會，宣布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同年11月，共產主義者同盟「委託」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宣言。次年2月21日，《共產黨宣言》出版，共產運動開始興起。

光照幫的邪教綱領以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教義均被共產黨完全繼承。例如，《共產黨宣言》宣稱：「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唯一的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列寧曾說：「我們必須使用所有詭計、陰謀、欺騙、狡詐、非法手段、隱蔽手段，並掩蓋真相。」

殘暴與欺騙，是共產黨政權的共性。共產主義學說，以創建「人間天堂」蠱惑人心，實際卻敵視人類。對人類的仇視，是所有共產主義思想「導師」的共同特點。近年披露的文獻和學者研究顯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是撒旦的信徒，或者說皮相為人，撒旦為魂。

1. 信奉魔教的馬克思

卡爾·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但是在大學期間加入了由喬安納·薩斯卡特(Joana Southcott)主持的撒旦教會，成為魔教的一員。

馬克思在給父親的一封信裡寫道：「一層外殼脫落了，我的眾聖之聖已被迫離開，新的靈必須來進駐。」而馬克思的兒子艾德加於1854年3月21日寫給他的信中，開頭一句竟然是「我親愛的魔鬼」。

此外，馬克思在詩作和所創作的劇本中幾次寫下「渴望上帝復仇」，並多次流露出對世界的「仇恨」。例如，他在《絕望者的魔咒》詩中寫道：「在詛咒和命運的刑具中，一個靈攫取了我的所有；整個世界已被拋諸腦後，我剩下的只有仇恨。」



▲ 2010年柏林工作人員在將馬克思塑像移走。(Getty Images)

馬克思學生時代寫過一部劇本《Oulanem》，其中宣稱，他為了將人類拖入地獄而存在。他寫道：「我年輕的雙臂已充滿力量，將以暴烈之勢，握住並抓碎你——人類。黑暗中，無底地獄的裂口對你和我同時張開，你將墮入去，我將大笑著尾隨，並在你耳邊低語：『下來陪我吧，朋友！』」

馬克思仇視德國人、中國人、猶太人，認為他們都是「小販」。他稱俄國人為「飯桶」，稱斯拉夫人為「垃圾人種」，是「反動」種族，應該立即在世界革命風暴中毀滅。他稱人類是「垃圾」，他們「粗言穢語」，是「一群混蛋」。

一方面，馬克思在著作中聲稱為無產階級奮鬥，另一方面他卻稱無產階級的人為「蠢蛋、惡棍、屁股」，稱黑人為「白痴」。

實際上，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他並不信奉「共產主義」。他只不過是利用「共產主義」為圈套，引誘無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去實現撒旦教的理想而已。最具諷刺性的是，對於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稱之為「糞——污穢之書」。

2. 殘暴的列寧

1917年「二月革命」後，流亡在外的列寧回到俄國，發動「十月革命」政變，推翻了臨時政府，奪取了政權。共產主義對人類的仇視，從蘇共這裡開始演變為實實在在的



▲ 1991年11月，柏林工作人員將毀掉的列寧雕像抬走。(Getty Images)

暴政和屠殺。

如同馬克思、恩格斯信奉撒旦教一樣，青年時的列寧也是如此。列寧的親密朋友兼同事托洛茨基在其寫的《青年列寧》一書中提到，列寧16歲時，曾從頸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將它踩在腳下——這是撒旦教中常見的一種儀式。作家阿麗德娜多次見過列寧，她寫道：「列寧是個邪惡的人，他長著一對狼一樣邪惡的眼睛。」

「對革命而言，保證成功的可靠手段是消滅統治階層和文化階層。」列寧奪權後，便依此行事。1917年，他親自建立了秘密警察組織——「契卡」(即「肅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設委員會」，「克格勃」前身)，並授予其全權逮捕、偵查、判決和執行的絕對權力，推行紅色恐怖政治。1918年，蘇俄建立了第一個勞改營，此後勞改營的數量在蘇聯埃俄國和後來的蘇聯大幅度增長。

列寧親自發起並由政治局集體決定，將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水準的知識分子驅逐出境，還鎮壓了要求實行自由選舉、自由貿易等的喀琅施塔得水兵。1922年，列寧在蘇共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開宣傳孟什維克主義者，我們的法庭一律予以槍決。」同年8月蘇共通過了《關於行政驅逐》法令，至當年年底，有二百多萬人被驅逐或被遣逃亡國外。

列寧的殘暴，還表現在其對沙皇尼古拉一家實施滅門槍決。1918年7月，被關押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未經審判，就被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下令開槍打死，共有11人被處死，屍體經過焚燒和硫酸毀容。而正是這個沙皇，在列寧流放期間，給予了他寬鬆自由的生活條件，每月還為他提供8盧布的津貼。

俄國思想家普列漢諾夫看出了列寧殘忍狂暴的面目，他臨終時口授了一份《政治遺囑》，其中提到，「列寧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什麼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向魔鬼結盟。」「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竟能殺死另一半俄國人。」

3. 獨裁者斯大林

斯大林是列寧的繼任者。他曾說：「最大的歡樂就是和一個人發展友誼，直到他信任地把頭靠在你胸口，你就可以一刀插在他背上——這是無與倫比的快樂。」

斯大林15歲時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背棄神，走向撒旦。日後，

當斯大林以革命者的身分進行寫作時，他用的第一個筆名是「惡魔」，另一個筆名則是「惡魔般的」。

1912年，「斯大林」成為其新的筆名，意思是「鐵人」。就連列寧都說，斯大林是「黨內最冷酷無情之人」。而蘇共黨內的重要領導人布哈林曾這樣評價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1930年，蘇聯建立了「古拉格」，即蘇聯「勞改營管理總局」。蘇聯勞改營後來成為各社會主義國家勞改營的典範。這些勞改營因為極端惡劣的條件而臭名昭著。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前，全蘇聯共有勞改營170所，遍布各個地區和角落。據統計，在1930年至1940年間，由於飢餓、勞動強度過大、遭受非人待遇等，有50多萬名古拉格勞改犯死亡，包括許多詩人、作家、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

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發生了餓死800多萬人的大饑荒。上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演變成對黨、政、軍、中央、地方幹部的全面清洗和鎮壓，共有200多萬人被鎮壓。據蘇聯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於斯大林暴政的人數約為2,000萬。



▲ 蒙古1990年移除了位於首都烏蘭巴托市中心國家圖書館前的斯大林塑像。(AFP/Getty Images)

4. 暴君毛澤東

毛澤東，是中共供在「神壇」上的暴君。毛澤東一生都喜歡整人，他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同樣嗜好暴力。毛澤東好鬥，「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鬥爭」，給中國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毛澤東執政期間，發動了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土地改革，鎮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這些荒唐而瘋狂的運動，造成數以百萬甚至上千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同時毀滅了中華傳統文化，破壞了中國社會的道德根基，可謂慘絕人寰。

1957年，毛澤東訪問蘇聯，當



▲ 藝術家高聶、高強的作品《懺悔吧！毛澤東》。(大紀元資料室)

時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共產黨都派了代表到莫斯科參加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公開講：「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

毛澤東肆無忌憚地說出了一個真相，那就是共產主義對生命的漠視。共產黨的暴力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只要共產黨存在，它的暴力本質就不會改變。

縱觀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人們都普遍敬畏上天、信仰神明，相信有天理在衡量人間的善惡。因此，人們能夠珍視生命、心懷惻隱、約束自己的言行，這對維持人類的道德水平與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共產黨卻要從根本上打掉人們對上天與神佛的信仰，而把那些狂妄凶殘、毫無道德底線的領袖們推上神壇，頂禮膜拜，並用政權權力強制執行，如毛澤東要人民不信神而信他。這是徹底的魔教表現。

根據《共產主義黑皮書》的統計，在20世紀，共產主義革命的死難者，在全球總計為近1億人，其中蘇聯2,000萬、中國6,500萬、越南100萬、北朝鮮200萬、柬埔寨200萬、東歐100萬、拉丁美洲15萬、非洲170萬、阿富汗150萬，死於未掌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約1萬。許多學者認為，以上數字要低於實際死於共產暴政的人數，如中國至少有8,000萬人。

如果不是魔鬼上身，如果沒有對人類的極端仇恨，怎麼可能製造這樣大規模的屠殺？而且這樣的悲劇發生在幾乎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裡。在正常社會中，這些共產黨的領袖們早已被視為十惡不赦的殺人魔、變態搶劫犯。所以，共產黨在組織形式上是流氓黑幫，背後是魔鬼的化身。

共產絕路

為害人間一個多世紀的共產黨，背後是魔鬼的化身，必須遠離和拋棄它。它帶給人類的，不是出路，而是絕路。

3 共產主義的「黨國體制」

共產主義體制實行的是黨高居於國家之上的「黨國體制」。共產黨在整個國家體系中無處不在，黨凌駕於一切行政機構、宗教團體和社會力量之上。黨是真正的決策者。黨控制著一切經濟資源、個人發展機會甚至人的思想。黨性高於人性，黨的需要高於一切，黨的正確性不容挑戰。

但是，黨的領袖們也知道自已不可能永遠正確，因而，他們只能用不斷的清洗和製造恐怖來消除那些指出他們錯誤的聲音。在共產黨的早期，他們會給對手扣上「修正主義」、「托派分子」、「反革命」等帽子，現在的罪名則「與時俱進」地變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毛澤東自己明明認識到「大躍進」犯了左傾冒進的錯誤，可是，當彭德懷指出這種錯誤時，毛就必須把彭德懷打倒。其背後的邏輯很簡單——如果彭德懷比毛澤東更正確，那麼彭德懷就更有資格領導人們奔向「共產主義天堂」，毛就應該把最高領袖的位置讓給彭了。所以當你提出與最高領袖不同的意見時，「篡黨奪權」的帽子，非你莫屬。

「文化大革命」時，劉少奇被打倒，也是因為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向黨的高級幹部證明了他比毛更正確。毛因此不得不退居二線。但是，當毛一旦捲土重來，



▲ 在中共的「黨國體制」下，即使國家主席也隨時會成為犧牲品。圖為劉少奇在文革期間被批鬥。(資料圖片)

劉就必須被置於死地。

由於共產黨在執政過程中錯誤不斷、罪行累累，欠下了無數血債，因此中共隨時都有失去權力的不安全感，尤其恐懼在失去權力後被追究罪責。

這種「不安全感」決定了共產黨必然會監視自己的百姓（如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所描述的「老大哥在看著你」），建立「一言堂」宣傳系統以美化自身，為自己的暴行辯護並禁止百姓發出聲音；在內部強調「黨性」，以保證領袖的意志可以貫徹執行；通過洗腦教育奴化人民，讓人民誤以為除了「黨的領導」別無出路等。

4 對內的鎮壓

「黨國體制」的建立，離不開暴力和謊言。對內鎮壓人民，是共產黨政權的通用手段。

「十月革命」後，1917年11月，全俄立憲會議選舉舉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只獲得了四分之一的選票。於是惱怒的列寧用機槍解散了立憲會議，開始用暴力清洗反對派和被懷疑為潛在反對派的所有人，執政的第一個月就殺死數十萬人。

1918年6月，蘇聯強制實行共產主義政策，導致經濟大崩潰。大陸學者的研究論文記述，「到1921年，俄國的重工業產量只有戰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75%的人口，莫斯科的人口也減少了50%。」

為了壓制民衆的不滿，列寧決定實行恐怖統治，僅僅從1918年到1922年2月，殺人不少於200萬。斯大林上台後，更開始了令人談之色變的大清洗。從政府到軍隊，一半以上的黨員被捕、清洗，軍隊高級將領從元帥、一級集團軍將領、二級集團軍將領到軍長、師長，每級軍官被槍斃的比例都超過百分之六十，甚至達到百分之百。

如此清洗運動，在中國也同樣發生過。

5 對內和對外的欺騙

單純依靠暴力的政權難以持久，於是，謊言出台，成為中共暴力的潤滑劑。凡是維持政權較長時間的共產黨，如蘇共和中共等，都深諳欺騙之術。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前高喊民主的口號，發布各種親美的文章，不但令很多知識分子受騙、投奔延安，加入反蔣介石的合唱，而且連美國也停止支持中華民國，最終導致國民黨敗退台灣，而大陸則淪陷到中共手中。

之後中共開始系統地篡改歷史，將「萬里大流竄」的敗退逃跑，宣傳為「北上抗日」的長征；將躲在陝北坐視國民黨抗日的共產黨美化成「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將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內戰改寫為「解放戰爭」；將餓死三千多萬人的大饑荒扭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將十年文革的責任全部推到「四人幫」的頭上；將「六四大屠殺」包裝為「平息反革命暴亂」；妖魔化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將數十萬甚至達數百萬人被勞教、被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的人權災難描繪成「中國人權最好的時期」，並大

言不慚地宣稱「中國是個法制國家」。

對外，中共「喉舌」媒體大肆輸出謊言，製造虛假新聞，欺騙國際社會，標榜其為「人民」服務，炫耀以犧牲生態環境和人民權益所換來的GDP的增長數字。面對外間的質疑，中共決定何時敞開國門、允許誰進來、讓他們看什麼、不能看什麼、可以或不可以與誰會面。另一方面，中共每年耗資100億美元，展開全面「大外宣」，以展現「軟實力」為名義，實則對外滲透紅色共產意識，將對內的嚴控延伸至海外，染指西方媒體的新聞自由，企圖動搖民主社會的根基。

在前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竊取了國家政權。而在歐美等許多自由國家，共產主義思潮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例如，在這些國家裡，雖未出現共產國家的暴力形式，但是，其所實行的高稅收、高福利實際上也和共產主義思維一脈相承，即「合法」地搶劫財富。此外，在共產主義思潮嚴重泛濫的國家，大多出現經濟停滯、族群撕裂、背離傳統等問題。

6 反傳統和反人類的手段

共產黨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教育體制都是反傳統的。為了配合鎮壓，它經常採用的宣傳手法是：妖魔化某個團體，如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分子、六四暴徒、法輪功修煉者等，以此煽動人民對某個被打擊群體的仇恨。中共的文宣系統早已淪為「反人類」或「種族滅絕」的宣傳機器，它所宣揚的道德觀也是反人類的。

1. 經濟上的反傳統理論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人應該以勤勞和才智養活自己，做生意也要公平交易、童叟無欺。但是，「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本質上都是「搶劫」和「變相搶劫」。即使在當今的正常社會裡，試問，誰願意自己的合法財產、辛勞果實被別人強行奪走？人們出於善良和同情，施捨助人，那是人性美好的體現，但是，一個國家政權或任何人若公然搶奪他人的正當財產，則違背了基本人性與天理。

時至今日，中共的各種強拆、對私企和外企高額徵稅、對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收費、各種亂罰款、對自然環境的掠奪、對世界知名品牌的「山寨」和對外傾銷等都是「搶劫」思想的延續。

在西方社會裡，為了維護自由公平的競爭，法律必須秉持公義，因此即使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其核心價值也與這些國家的傳統道德和法律一脈相承。這也體現出，儘管經濟和社會形式在變化，西方國家的價值觀是穩定的、傳統的。

反觀共產黨的「搶劫」則毫無公義可言，這種共產經濟理論，無論是中國傳統社會或是現代自由社會都無法接受。

2. 「反人類」的道德觀

道德是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因為來自神的誡命或者宗教經典，所以又可稱為「普世價值」。佛家認為人性中既有佛性、也有魔性，即善惡同存。正教信仰都是為了約束和去掉人的魔性，充實和增強人的佛性。當魔性盡除，人將回歸天國。人性中善的部分是與生俱來的，因此中國人把良知稱為「天良」。

而共產黨卻另外搞了一套道德體系，稱之為「共產主義道德」。「共產主義道德」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製造和訓練「仇恨」，如雷鋒所說「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在奪權階段，共產黨需要製造對現有統治者的仇恨；在奪權結束後，需要製造民衆之間的仇恨以避免群眾團結起來形成對抗共產黨的力量。因此，毛澤東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還要再來一



▲ 西藏僧人 Rempu Rimpoche 被戴上高帽遊街批鬥。(資料圖片)

次」等等。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共產國家的人們每天中午11點，要集中起來舉行長度為2分鐘的仇恨訓練儀式，對著屏幕上出現的黨的仇敵尖叫、咒罵，發洩心中的恐懼和憤怒。這個看起來荒謬的場景，六十多年來，其實一直在現實的共產國家裡以其它形式出現。文革時群情激憤的批鬥，呼喊「砸爛XXX的狗頭」，到文革後的「嚴打」，再到針對「六四暴徒」的抹黑，還有針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的污蔑。偶爾還會有民族主義的表演，諸如針對台灣、日本、美國和各種「亡我之心不死」的「反華勢力」的文攻武嚇，都與中共培植的「仇恨」息息相關。

共產黨每次運動必先煽動仇恨，通過宣傳機器將對手抹黑成走資派、修正主義、黑五類、叛徒、邪教分子等，為其鎮壓找藉口。同時也通過這種方式，系統敗壞人類的道德，泯滅人的同情心和冷靜的判斷力。不僅如此，還用「人人表態」的方式，讓每個人都沾上鎮壓的血債，至少是道義上的血債。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這表明共產黨的仇恨訓練必須持續不斷地進行。共產黨的各種政治運動除了製造恐怖之外，也在試圖摧毀人與生俱來的道德感，即摧毀良知。在共產極權體制下，一個嬰兒在出生後則必須在政治運動中被改造成為喪失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的「非人」。因此，中共宣揚「黨性」至上，扼殺人性，就是「反人類」。



▲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在全國範圍內「破四舊」，圖為寺廟中的佛像被付之一炬。(資料圖片)

3. 毀滅民族文化

上述分析表明，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是反傳統的，在道德上是反人類的，因此任何傳統的道德觀念都會對共產黨的政權形成威脅。所以，在暴政下，傳統文化作為道德的載體，無法倖免於難。人類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對文化的毀滅發生在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損毀殆盡。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首先開始消滅文化的最精髓部分——宗教：在「鎮反」過程中大量屠殺宗教信徒，再派偽宗教學者打入宗教內部篡改教義。1957年，當幾大宗教相繼成立中共領導下的「宗教協會」後，中共在信仰層面的破壞工作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隨後中共開始在文化層面整肅知識分子，發動「反右」運動。

1966年，一批被無神論洗腦、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從未受過傳統文化教育，正步入煩躁叛逆的青春期。這時，中共發動了從器物層面毀掉中華文化的運動，即一場遍及全國、狂飆突進的「破四舊」，由此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平毀寺廟、焚燒佛經、毆打教徒、焚毀古玩字畫、砸爛文物遺蹟、打倒文化精英，十年浩劫，文化巨難，民族之傷。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黨，像中共那樣污蔑自己的祖先，否定祖國的歷史和文化。回顧十年文革，中共安排之系統、手段之恐怖、計算之精準、方法之惡毒，遠遠超過了普通人能夠理解和想像的範疇，這也驗證了《九評共產黨》的論斷——共產黨是邪靈。

結語

一百年來，共產黨在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國家中建立過政權。1億人被屠殺、被餓死，無休止的掠奪，無所不在的告密和恐怖統治，不斷地發動運動虐待人民，在自由社會裡這些悲劇何其荒謬？而在共產主義的狂潮中，它卻正當地發生了，每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難以倖免。

如今，大多數共產政權已經解體，只有中國和朝鮮等極少數國家仍在撐著一面「紅旗」。在這些國家裡，真相被掩蓋，讚歌仍高唱。紅色的土壤尚存，毒素依然會滋長。此時，務必審思：共產主義帶給人類的到底是什麼？

有些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認為共產主義是一種出路、一個辦法，其實不然。實踐證明，共產主義的存在，毒害了很多國家，它不僅令共產國家的世代民衆飽受摧殘，而且侵蝕了西方社會的文明和道德根基。

《九評共產黨》指出，共產黨是邪教，是邪靈附體。共產黨在任何問題上都表現出狡詐，

背後裡幹盡壞事，使用了各種手段來破壞人類。共產黨因其撒旦屬性，利用人類的弱點讓人遠離傳統、背離神明，同時用各種欺騙手段麻痺人的良知，以暴力摧毀人的肉體和靈魂。共產黨反對一切傳統文化和道德，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毀滅人類。

因為共產政權百年來的虛假宣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很多人頭腦裡還留有印記，不少人看不清其本質與危害。在現存共產黨的國家裡，悲劇仍在繼續，共產黨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尤其在中國，中共對「真、善、忍」的迫害已經持續了十八年。但歷史的車輪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類的未來取決於自身在善惡中的選擇。

在動盪、衝突、反思與期盼中，人類走到了巨變的前夕。面對紛繁世事、亂象迷題，真正的出路在於明辨是非、識別真相，在於回歸傳統、恢復道德。為害人間一個多世紀的共產黨，背後是魔鬼的化身，必須遠離和拋棄它。它帶給人類的，不是出路，而是絕路。◇

► 2001年1月23日，中共喉舌央視在江澤民集團授意下炮製天安門自焚偽案，妖魔化法輪功。圖為央視架設的攝影棚。(視頻截圖)





名媛歷劫

她們風華絕代，宛如降落人間的仙女，哪堪中共魔鬼般地凌辱？本是萬千寵愛集一身，血淚冤屈無處訴，十大名媛被逼香消玉殞。「七仙女」嚴鳳英，更是直接墮入「人間地獄」……

歷盡文革劫難的「七仙女」

「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帶笑顏。」一曲傳唱大江南北的《天仙配》，成就了中國五大劇種之一的黃梅戲，更讓人們記住了一個墜落凡間的「七仙女」——嚴鳳英。

或許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戲臺上仙凡相戀的故事本源，其實講述的是孝感動天的美德故事；嚴鳳英在戲曲名家的光環背後，則有一段含冤莫白、血淚無限的傷痛記憶，至今仍是國民不堪回首的人間慘劇。

■ 文：葉萊

1 學戲，以生命為賭注

1930年，嚴鳳英出生於安徽桐城，乳名鴻六。這個戲曲界的精靈，恰恰生長在黃梅戲之鄉。在她成名以前，黃梅戲只是山村草臺上的地方小戲，唱戲的人更為鄉鄰所不齒。桐城人幾乎都會哼唱一兩句小調，但如果有人以歌戲為職業，便會受到家族的懲罰。嚴鳳英自小耳濡目染，便愛上了黃梅戲，13歲時偷偷跟同族的藝人嚴雲高學藝。

天生的好嗓子加上生動的表演力，使嚴鳳英很快成為戲班裡的佼佼者，別人學三遍才會的戲，她能一遍成功，大約一年後便登臺獻唱。

女孩學戲觸犯了宗族的禁忌，她差點被族人沉塘。為了保命，嚴鳳英

只得背井離鄉，走上搭班唱戲的賣藝之路。她在江淮一帶漂泊，結識了永泉等老輩黃梅戲名家。每當老前輩在臺上演出，嚴鳳英都用心觀摩，一點一滴模仿。再加上女子特有的細膩天性，她演繹旦角越發得心應手。

過去的人除看戲外，更講究「聽戲」，因而對演員唱功的要求非常嚴格。老藝人常常訓練她，唱戲必須唱到前後左右的觀眾都能聽清的境界。因在草臺唱戲，四面都有觀眾，如果遠處的人聽不到，就會喝倒彩、扔石頭起哄；如果聽不清，就會諷刺演員「嘴裡含個蘿蔔」。

為了滿足觀眾的要求，嚴鳳英每天堅持吊嗓子、練身段，唱完戲



後還會特地詢問站得最遠的小販，有沒有聽見、聽清。草臺搭戲的演藝經歷，助她錘煉了精湛的技藝。

黃梅戲一行歷來有「男怕《會母》，女怕《辭店》」一說，因《小辭店》要求旦角在臺上演唱50多分鐘，最考驗功夫。而嚴鳳英15歲時就能從容駕馭此劇的主角柳鳳英，也因此更名「嚴鳳英」，在戲曲界嶄露頭角。她的唱腔明快清圓，演技惟妙惟肖，更善於吸收京劇、越劇、民歌等傳統藝術的長處，表演風格自成「嚴派」一家。

就在嚴鳳英醉心曲藝事業的發展時，戲外的世界，由於中共的建政，早已換了人間。那麼嚴鳳英在這場政治漩渦中如何選擇呢？



▲左圖：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嚴鳳英。右圖：嚴鳳英(中)《天仙配》劇照。(資料圖片)

3 莫須有的反革命罪名

遭文革批鬥，對嚴鳳英來說是一場無妄之災。初期，她因為演唱黃梅戲，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線人物」「封資修代表」等罪名，屢遭「文批武鬥」的折磨。嚴鳳英感到茫然。

1968年3月，因受四年前「天津黑會」反江青運動的牽連，她與一批文化精英被污蔑成「圍攻樣板戲，反對江青」的罪人。

與嚴鳳英一同蒙冤的柏龍駒說，這次定罪發生在文革的第三年，中共「需要擴大『戰果』來證明它的『必要性』和『及時性』」，便「拋出一批各界代表人物來『祭旗』」。而他們反對樣板戲的直接罪證，來自對觀摩現代京劇一事的造謠和污蔑。

1964年，江青在北京發起全國性的京劇現代戲會演。在安徽省文化局工作的柏龍駒與嚴鳳英等三位戲曲演員隨後進京，在人民大會堂觀看「革命現代戲」《智取威虎山》。看戲時，他們僅從專業角度發表幾句評論。沒想到四年後，這次北京

之行被官方定義成「有預謀、有計劃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大罪。安徽省觀摩組與嚴鳳英一行人，都成為重點審查對象。

1968年4月5日，政府機關報《紅安徽報》發表歪曲事實的社論：她們圍攻江青的革命現代戲。報上說：「這是一起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至今沒有批判處理。」次日，劇團內外的造反派輪番提審嚴鳳英等人。

柏龍駒記得，那天是週六，造反派扣下嚴鳳英，逼她揭發省委、宣傳部、文化局等一千人的反動證據。尚存道德底線的嚴鳳英明白，這是要通過她製造一大批冤案，因而緘口不言。一直僵持到晚飯時分，造反派才放她回家，但命令她下週一上午上交材料，否則後果自負。嚴鳳英想不通，為什麼造反派要逼她出賣良心。週日晚，她冒著「串供」的風險來到柏家，傾訴內心的委屈與困惑，臨走前留下一句話：「我站得直做得正，只是眼前難熬啊！」

2 《天仙配》和「七仙女」背後的故事

1951年，嚴鳳英在安慶「群衆劇場」演出。這時中共幹部與「新文藝工作者」滲入演藝界，「幫助」嚴鳳英等「舊社會」的藝術家接觸「新文藝思想」。因而，嚴鳳英除了表演《打豬草》《鬧花燈》等傳統戲外，還唱改編戲，為中共的土改、反霸、抗美援朝等運動塗脂抹粉。

在大環境的影響下，家喻戶曉的《天仙配》為宣傳中共的婚姻法而出現。中國人從古代到民國時期，對待婚姻大事都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還要經過合八字等諸多儀式，體現了敬天信神的理念。中共占領大

陸後，於1950年頒布「新婚姻法」，歪曲傳統婚姻為包辦、買賣婚姻，鼓吹自由婚戀。為推廣新法，傳統戲《天仙配》被路洪非等「新文藝家」篡改成一部符合政治需要的新劇。

1953年嚴鳳英調入安徽省黃梅戲劇團，隨後參加華東區戲曲會演，首次飾演「新天仙配」的七仙女。

1955年，上海電影製片廠翻拍電影，嚴鳳英經典的七仙女形象就此確立。片中，原本奉旨下凡的七仙女成了私自下凡，秀才董永變成農民，主動焚契並贈送董永銀兩的傳員外成了百般刁難的惡霸……面目全非

的《天仙配》淪為當權者操縱的工具。

伴隨著電影的轟動效應，黃梅戲一躍成為全國大劇種，社會上湧現出一系列跟風的戲曲電影；一心一意遵照中共政策的嚴鳳英，也成了為黃梅戲做出巨大貢獻的藝術大師。

歌舞昇平的表象背後，包藏不住中共毀壞傳統文化、毀滅國民道德的禍心。1966年爆發的文革運動，將神州大地變成血腥的修羅場，那些追隨中共的文藝家幾乎沒能逃脫厄運的降臨，嚴鳳英幾乎是被迫害得最慘的一位。

文革中自殺的10位名媛

中共十年「文革」，慘案無數。

其中有不少美麗而知名的女性在「文革」中遭受凌辱，被逼選擇自殺而結束生命。

嚴鳳英
嚴鳳英，安徽桐城人，1931年生，表演藝術家。「文革」中慘遭批鬥。1968年4月7日夜服下大量安眠藥身亡。

李翠貞
李翠貞，上海郊區南匯縣人，鋼琴家。「文革」中遭極大污辱，她不堪屈辱，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精心化妝，然後擰開煤氣自殺。

趙慧深
趙慧深，四川宜賓人，表演藝術家，1911年生。「文革」中屢遭批鬥，因飾演過妓女，遭肆意侮辱，於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殺。

上官雲珠
上官雲珠，原名叫章均華，又叫章亞君，1920年3月2日生。電影表演藝術家。「文革」遭猛烈攻擊，1968年11月23日跳樓身亡。

言慧珠
言慧珠，北京人，蒙古族，1919年生。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言菊朋之女，梅蘭芳之徒。「文革」被批鬥毆打，1966年9月11日自殺身亡。

舒繡文
舒繡文，話劇、電影表演藝術家，大陸第一名女配音演員。「文革」中被作為「黑線人物」，遭到整治，於1969年春在獄中自殺身亡。

朱梅馥
朱梅馥，大陸翻譯家傅雷之妻。1966年9月3日凌晨，在遭受紅衛兵抄家和四天三夜的批鬥亂跪凌辱後，與傅雷在家中先後自殺。

小白玉霜
小白玉霜，原名李再雯，祖籍山東。評劇演員、白派創始人白玉霜養女。「文革」中遭受毒打後，她吞食安眠藥自殺，年僅45歲。

顧聖嬰
顧聖嬰，江蘇無錫人，鋼琴家，1937年生。「文革」遭到衝擊，於1967年1月31日與媽媽、弟弟三人哭成一團，全家開煤氣自殺。

陳璉
陳璉，浙江慈溪縣人，1919年生，係蔣介石「文膽」陳布雷之女，被誣為叛徒、特務，1967年11月19日跳樓身亡。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種研究數字與中共官方數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數百萬人被迫害致死；而中共元老葉劍英曾在內部會議中透露，「文革」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鄧小平曾向外國記者承認，「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

4 在死神面前的批鬥

4月7日夜裡，嚴鳳英痛苦呻吟，丈夫王冠亞驚醒後發現了她的絕命書，才知道妻子偷偷服下大量安眠藥求死。王冠亞只好一面叫長子請醫務室的醫生搶救，一面帶著妻子的書信，向進駐劇團的軍代表劉萬泉求救。豈料劉萬泉不顧人命，帶著幾個造反派直闖王家，對神智尚清的嚴鳳英進行「床前批鬥」。

劉萬泉等人不理會王冠亞的苦苦哀求，怒斥嚴鳳英：自殺是「叛黨行為」、「對抗文化大革命」。足足折騰了半個多小時，直到她眼不能睜、口不能言、淚流滿面、口吐白沫時，這幫人才揚長離去。王冠亞趁機把妻子送到了附近醫院的急診部。那時自殺的「反革命」如果沒有單位介紹信，醫院一律拒收，而且認為「反革

命死一個少一個」。王冠亞不敢離開妻子，只好讓長子再去求劉萬泉。

幾經周折，長子拿來了介紹信，醫生檢查後卻安排嚴鳳英轉移住院部。從市中心的急診部到郊區的住院部，嚴鳳英早已錯過最佳搶救時機。到了住院部，她一身單衣，躺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等待救治。兩個年輕的醫生為她施救，卻不見效。王冠亞看到一個老醫生戴著「反革命」的黑色袖章打掃廁所，上前求他診治。老醫生卻說：「他們叫我醫，我一定醫！」但是，沒有人敢替「反革命」做主。

就在造反派的批鬥、親人的焦慮與醫護人員的互相推諉中，嚴鳳英於1968年4月8日清晨5點停止了呼吸。還差5天，就是她的38歲生日。

5 屍骨未寒 解剖尋罪證

對生命最殘忍的方式，莫過於致人於死地，但是代表中共意志的軍代表，卻還要千方百計地繼續迫害受害者。劉萬泉出面，「揭發」嚴鳳英是國民黨特務，喝令醫生當場解剖她遺體，尋找她吞下的「罪證」——發報機和照相機。為了這個不合常理的罪名，沒有學過解剖的醫生拿來醫用小斧，當眾剖屍。

他先脫去嚴鳳英的衣服，用斧頭從咽喉一直砍到腹部，除了100多片安眠藥，什麼罪證都沒找到。劉萬泉還不死心，下令繼續「深挖」。醫生一斧劈開屍身的恥骨，致使膀胱破裂，噴出尿液。殺人魔鬼這才停下迫害的黑手。

事後，劉萬泉被評為「活學活用毛著的積極分子」，還被調任到外省保護起來。文革結束後，安徽省派出的調查組找到他詢問嚴鳳英一案，他對自己的行為供認不諱，而且振振有詞稱自己是奉命行事。他說，文革就是要打倒「反革命分子」，「在安徽，不打嚴鳳英打誰呀！」

十年之後，這場浩劫應如何反思，又該如何定罪？中共官方除了清算「四人幫」，為冤死者恢復名譽外，仍然在維護政權穩定的前提下，對當年的真相諱莫如深。這種善後策略，對上掩蓋了元凶毛澤東的罪孽，對下淡化了一眾暴民的罪行。

1978年，嚴鳳英在悲慘離世的十年後，得到平反的虛名，當年一手導演人間慘案的軍代表，一直隱匿在未知的角落，安度餘生。

好在中國還有一批正義人士，徹底追查劉萬泉的下落，曝光他的惡行，要給嚴鳳英家人一個交代，還民眾一個真相。

海外知名人士蘇曉康、解濱等人，都公開撰文表示，劉萬泉的行為構成反人類罪。《國際刑事法院羅馬條約》規定，任何以極端殘暴的方式迫害或大規模殘害他人的行為，即反人類罪。而文革時期出現的反人類罪，何止劉萬泉一個？中共執政至今犯下的反人類罪，又何止文革一次運動？◇



大師之死

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再無大師出現。而民國時期湧現了一批學貫中西的大師，他們中經歷中共統治的，個個慘遭迫害，「三百年一見」的國學大師陳寅恪就是其中一位。

國學大師陳寅恪之死

文：林輝

與中共統治下鮮有大師不同，民國時期湧現了一批學貫中西的大師，按照一些描述民國時期的書籍所言，他們是一批有「骨氣」而又「好玩」、「有趣」且學問深厚之人。他們有時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對於世事，亦常有驚世駭俗的作為。而他們可以如此「恣意妄為」正是得益於民國政府的寬容。

彼時，無論是北洋軍閥政府，還是蔣介石治下的南京、重慶國民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人格、知識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識分子對待政府則是：你不對的時候我批評你，你對的時候，我就支持你。毫無疑問，能夠形成這種相互信任關係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民國政府的誠意。

然而，中共建政後採取的殺伐政策，不僅使留在大陸的國學大師們一個個慘遭迫害，甚至慘死，而且也徹底使知識分子的脊梁彎曲。1949年後中國大陸再無大師出現也是必然，因為出現大師的土壤已被完完全全地破壞。本篇說的是民國最為著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遭受中共迫害的經歷。

陳寅恪這個名字，在民國時期可是響當當的。他，沒有文憑，卻被清華大學聘為教授，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其課



▲ 歷史學家陳寅恪。(資料圖片)

堂常常擠滿來自北京其它高校的學生。他，知識淵博，通曉二十多種文字，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其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卻為人低調、謙遜。他，雖潛心學問，卻從不失傲骨，「思想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貫穿其一生，而他也極有可能是最早讀過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

2 洞穿馬列主義危害

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與燕京大學研究生石京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覺得俄國人很可怕的陳寅恪，沒想到的是，從自己留在中國大陸的那一刻起，以俄國人為師的中國共產黨的可怕開始觸手可及。1950年前後，陳寅恪由筆寫了一首名為「經史」的詩來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危害的認識，詩中寫道：虛虛處處意何如，淡刻陰森慘不舒。就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

這首詩陳寅恪引經據典，還著實讓人費解。後經幾位學者多番揣摩考證，終於了解了詩的真意。

第一句中的「虛經」，指的是1938年起出版至斯大林逝世，在蘇聯重印300次、發行4,200萬冊的《聯共

(布)黨史簡明教程》。它被稱為「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腐史」通常指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受腐刑後寫成的《史記》，詩中則暗示蘇聯學者是在嚴刑脅迫下寫成的「虛經」。書中顛倒黑白，美化蘇共上世紀30年代的集體化和大清洗，為斯大林鎮壓、流放上千萬老黨員、幹部和農民的罪行歌功頌德，難免充滿陰森之氣。「淡刻」用的是《世說新語》的典故，指陳仲子行為「苛刻」，暗諷馬列思想的殘酷。顯然，陳寅恪認為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十分嚴酷可怕。

第二句「魯論開卷語」指《論語》開卷《學而》篇首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全句是說大學師生忽然異口同聲，人談學習，個個學馬列。「說瓜千古笑秦儒」是說知識分子為中共一網打盡而不自知。

全詩大意就是：馬列主義教條禁錮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知識分子競相學習馬列主義，其實是自投羅網，盡入統治者的彀中。可以說，《經史》一詩是陳寅恪對後來盛行的政治學習的表態之作，之所以曲筆，自然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衝擊。

而當時的現實正如陳寅恪詩中所描述的那樣，中共統治大局已定後，全國知識界開始了思想改造。

從1951年9月下旬，中共強迫中小學教師職員和專科以上的學生交待自己的歷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而採用的手段皆來自於延安整風運動，比如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等。一些知識分子不堪壓力，或選擇自殺或逃離大陸，而更多的知識分子則通過思想改造運動，接受了效忠的對象是共和毛澤東。從此，人人言必稱馬列，著述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為榮。由於朝鮮戰爭，這一改造運動暫時中止，但幾年後，中共掀起了對知識分子的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1957年陳寅恪在給朋友劉銘恕的信中有云：「弟近來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志筆記等）。固不同於乾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真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說」？

歷史學家余英時看出了此中真義：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真人是「列」禦寇。陳先生其實是說，他研究歷史決不用「馬列主義」啊！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為陳寅恪也！由此亦可了解陳先生曲筆所寫的《經史》一詩對馬列主義危害的深刻認知。

3 遭瘋狂迫害慘死

《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還披露了陳寅恪最後的時光和慘死的經過。

1966年文革爆發後，中山大學的造反派們將矛頭對準了這位早已雙目失明的老人。陳寅恪由原來的大字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水漲船高地被封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污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

隨著陶鑄被打倒在地，曾受其保護的陳寅恪的處境也變得十分艱難。助手黃萱被趕走，三名護士被撤除，工資停發，存款凍結，陳家居住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望之令人恐怖驚悚。

更為恐怖的是，大字報逐漸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櫃、床頭，甚至陳寅恪的衣服皆由大字報貼蓋。面對此情景，夫人唐筼曾發出「人還沒死，已先開弔了」的哀怨。

瘋狂的造反派們還對陳家財物進行了大規模的掠奪，陳寅恪後半生積攢的書籍全部被查封，手稿被

掠。唐筼先祖遺留的一點紀念性首飾及陳寅恪歷盡千難萬險、十幾年戰火燒倖保存下來的二十餘封祖父往來手札亦被劫走。陳家財物盡失。

造反派們為了驗證中大流傳的「陳寅恪有驚人記憶力」說法的真偽，將躺在病床上的陳寅恪拖下床，強迫其背誦毛語錄，倘若不肯背誦或有一句背錯，便遭到辱罵和毒打。

為了達到將陳寅恪迫害致死的目的，造反派們想出了一個毒計：先是把幾隻大字號高音喇叭吊至陳宅窗前屋後，讓其聽取革命群眾對其發出的怒吼之音。雙目失明、不辨牛馬且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陳寅恪，突聞幾個「怪物」整日在耳邊嗷嗷叫不止，當即抱頭在床上打起滾來。

造反派們一見十分興奮，遂將高音喇叭乾脆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頭之上播放。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旋地轉，雙雙心臟病復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正月，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面透風的小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見

他躺在病榻上已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望者無不悽然。

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相愛至深的陳寅恪夫婦常常相對而泣，感嘆命運的悲苦。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1969年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溘然長逝。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唐筼亦撒手人寰，追隨丈夫而去。

據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說：「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裡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

三百年一見的國學大師就此遠去，真乃中國文壇之大不幸也！中共罪孽何其深重也！

1 北京赴任提條件

根據大陸出版的《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陳寅恪因為種種原因，沒能離開大陸，從此命運便註定。他先在嶺南大學任教，後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他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並在此度過了最後二十年。

1953年，「喜歡歷史」的毛澤東決定，中共中央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由陳伯達、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等「紅色學者」組成，毛欽定陳伯達任主任。同年10月，在毛的提議下，歷史研究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增設三個研究所，遠古史研究所所長為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為陳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為范文瀾。

委任狀下達後，郭沫若與范文瀾均馬上赴任，唯有陳寅恪不為所動。當時，不時有北京來客到廣州說服陳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歷史學系副教授汪錢。當時汪錢懷揣著兩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寫的，一封是副院長李四光親筆所寫。

陳寅恪對前來勸說自己的汪錢如此說道：「做學問，不應有『在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指導下』這種定

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主張學術自由的陳寅恪還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對於陳寅恪所提的兩個條件，中共自然沒有答應，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終不了了之。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此後，陳寅恪雖然受到了批判，但在中研第一書記陶鑄的關照下，在中山大學度過了一段還算平靜的生活。

中共迫害致死的部分文化名人

熊十力 1885年生，湖北黃岡人，國學大師。面對西學的衝擊，重建儒學，被稱為20世紀中國最傑出哲學家。1968年5月23日絕食身亡。

蒙文通 1894年生，四川鹽亭人。著名歷史學家 and 經學家。1957年被劃歸右派後歷盡折磨，1968年遭紅衛兵毒打後不久含冤去世。

劉盼遂 1896年生，河內淮濱縣人。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語言學家。1925年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問教於王國維、黃侃、梁啟超門下；1946年起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任古典文學教授。1966年自殺身亡。

老舍 1899年生，北京人，滿族。著名小說家、劇作家。1949年後歷任全國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等職。代表作有小說《駱駝祥子》、話劇《茶館》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殺。

傅雷 1908年生，上海南匯縣人。著名翻譯家。傅雷



學貫中西，文學、美術、音樂、外語「四位一體」，著作等身。1968年9月2日，傅雷夫婦被揪到大門口站在長凳上戴上高帽子批鬥，慘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婦先後服毒、投縊自盡。

陳夢家 1911年生，浙江上虞縣人。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16歲開始寫詩，師從徐志摩、聞一多。1949年後曾任考古所學術委員、《考古通訊》副總編。

1966年9月3日自殺身亡。

曾昭掄 1899年生，湖南省湘鄉縣人。曾國藩侄孫，與妻子俞大綱都是民國知名學者。文革時紅衛兵將俞大綱教授上衣剝除，用皮帶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憤難抑，是夜仰藥自盡。四個月後曾昭掄也被含冤折辱。

葉企孫 1898年生，江蘇省上海縣人。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

一。曾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文革中因學生熊大綱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一度精神失常，1977年1月悲慘死去。

饒毓泰 1891年生，江西臨川人。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曾在北京大學任教。文革中飽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階級隊伍」時自縊身亡。

謝家榮 1898年生，江蘇省上海縣人。地質礦床學家、地質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學部委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開始即因是反動學術權威而受批鬥打擊。因不甘屈辱，於1966年夫妻雙雙飲恨自殺。

馬連良 1901年生，回族，北京人。著名京劇藝術家，老生演員。民國時期京劇三大家之一。文革爆發後被打成「漢奸」、「戲霸」。紅衛兵抄家洗劫後，將他關押在劇院小屋內，時常揪出批鬥。馬連良在凌辱和恐嚇中，於

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

周瘦鵑 1895年生，江蘇吳縣人。現代著名作家。著有長篇言情小說《新秋海棠》等，係「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殺。

翦伯贊 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著名歷史學家，有《中國史綱》等18部著作行世。1949年後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68年12月18日借妻戴淑宛雙雙自殺。

吳晗 1909年生，浙江義烏縣人。歷史學家。1949年後，先後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後又任北京市副市長。1969年10月11日在獄中自殺身亡，死前頭髮被拔光。

鄧拓 1912年生，福建閩侯人。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和社長等職。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於5月18日含恨自縊身亡。

楊朔 1913年生，山東蓬萊人。著名作家。1949年後曾任中國作協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文革後被中國作協列為重點批鬥對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藥自殺。



乒壇悲劇

在中國乒乓球運動史上，有三位來自香港的球員，被譽為「乒壇三傑」。他們於上世紀 50 年代返回內地，叱吒乒壇。然而，1968 年的 4 月、5 月、6 月，在兩個月零四天內，這三人相繼上吊自殺，永遠離開了乒乓球桌。

「乒壇三傑」文革自殺悲劇

■ 文：高天韻

1 傅其芳 (1923—1968)

傅其芳的名字，被刻在「斯韋思林杯」上，那是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團體冠軍的獎盃。傅其芳曾經擔任中國國家乒乓球男隊教練，指導出了容國團、莊則棟、徐寅生、李富榮等一大批高手，並且率隊連續三年捧得「斯韋思林杯」，威震世界乒壇。



▲ 曾經擔任中國國家乒乓球男隊教練的傅其芳。(資料圖片)

傅其芳是浙江寧波鄞縣五鄉鎮人，小學時開始乒乓球訓練，後去香港謀生，在乒乓球房當陪練。他曾經擊敗過到港的英國名將，漸漸有了名氣，受邀參加了東南亞的一些比賽。1952 年在新加坡，傅其芳代表的香港隊戰勝了日本隊，奪得亞洲冠軍。領獎後，一位年邁的華僑女教師對他說，要是他能代表中國，那該多好。

於是，1953 年，傅其芳回到內地，希望報效祖國。他先後在一系列國際賽事上取得佳績，並且潛心鑽研乒乓球技術，見解獨到。他明

確指出，中國的乒乓球員應該堅持走自己的路，發展中國傳統的直拍快攻打法。

從 1958 年起，傅其芳擔任國家乒乓球男隊教練。他知人善用，指導容國團奪得了第 25 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單打冠軍，這是中國人在世界體育大賽中取得的第一個冠

軍。接著，在 1961 年北京第 26 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他率領中國隊擊敗了日本隊，第一次為中國捧回斯韋思林杯。

在他執教期間，中國男隊獲得了第 26 屆、第 27 屆、第 28 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男子單打、男子團體世界冠軍。為此，國家體委在 1961 年、1963 年兩次授予傅其芳體育運動榮譽獎章。1964 年起，傅其芳擔任了中國乒乓球協會副主席一職，同年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傅其芳還與梁燁輝教練合著了十萬字的《乒乓球訓練法》。

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其從香港歸來的身份，傅其芳被指為中國國民黨組織「三青團」的特務、奸細而遭到批鬥。他被揪出來遊鬥、毒打。1968 年 4 月 16 日，在北京體育館，傅其芳離開開押他的房間，來到旁邊的一間小房，反鎖房門，在掛窗簾用的銅槓上自縊身亡，時年 45 歲。

3 容國團 (1937—1968)

他是中國體育史上第一個世界冠軍。他曾說：「人生能有幾回搏。」

1968 年 6 月 20 日清晨，在龍潭湖附近的養鴨房內，容國團已經徘徊了兩個小時，留下了一地的「大前門」菸頭。後來，人們發現他掛在樹上，用一條尼龍繩自縊，31 歲的生命戛然而止。離此地不遠，溫柔的妻子、可愛的女兒和年邁的老父正等著他回家。他的家，就在崇文區幸福大街，而幸福離他太遠了。



▲ 凱旋的榮國團攝於機場。(資料圖片)

容國團生於香港，原籍廣東省中山縣。他出身貧寒，愛打乒乓。少時，他憑藉獨創的直拍技法成為「街頭球王」。1954 年，17 歲的容國團在香港乒乓球埠標賽獲得冠軍，1956 年，他戰勝了 23 屆世乒賽日本新科狀元狄村，一戰成名。

1957 年 11 月 1 日，20 歲的容國團進入廣州體育學院學習。當天夜裡，他激動地寫下日記：「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當我踏入廣州體育學院所在地時，早已相識的乒乓球運動員紛紛向我握手問好。這時候，我心裡充滿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個，現在終於如願以償。1957 年 11 月 1 日夜。」

隨後，容國團在廣州體委的一次大會上，立下「三年奪取世界冠軍」的誓言，引起轟動。1959 年 4 月在聯邦德國多特蒙德第 25 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教練傅其芳力排重議，啓用容國團。容國團不負眾望，戰勝匈牙利名將悉多，為中國奪下了第一個乒乓球男子單打世界冠軍，也是中國體育史上的第一個世界冠軍。

容國團獲勝後，中共副總理賀龍親自到機場接機、獻花。後來他也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多次接見。當有外國政要來訪時，容國團經常是座上嘉賓。1958 年，容國團獲得「國家運動健將」稱號。1959 年、1961 年，他兩次獲得國家體委頒發的體育運動榮譽獎章。1964 年，容國團擔任中國乒乓球女隊教練。中國女隊在第 28 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了女子團體冠軍。

榮譽過後，風暴降臨。轟轟烈烈的文革開始了。「革命」烈火使體育界淪為「重災區」。賀龍受到批鬥，中共體委副主任榮高棠也被炮轟。

1967 年 9 月 4 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體育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中號召：不同觀點的革命組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劉、鄧、陶，以及賀龍、榮高棠。這就是大方向。

在當時的「革命」形勢下，有一種說法是：運動員成績越好，奪取冠軍越多就越反動。這讓容國團困惑而備感壓力。此外，容國團在香港的成長經歷也給他帶來了「特務嫌疑」的帽子。他和國家隊主教練傅其芳、北京隊主教練姜永寧三人都被隔離審查。迷惘之下，第 30 屆世乒賽開賽在即，容國團和隊友起草了請戰書，希望以行動證明自己。

1968 年 5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命令》（時稱「五一二命令」），宣布：「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包括國防體育俱樂部系統），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夥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賀龍、劉仁、榮高棠等完全按照蘇修的辦法炮製起來的，長期脫離黨的領導，脫離無產階級政

治，鑽進了不少壞人，成了獨立王國。……特決定全國體育系統全部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接管。」

霎時間，「砸爛獨立王國」「揪叛徒、特務、走資派」的狂風驟起，各級體委機構、各項體育協會和體育俱樂部幾乎都被撤銷，國家體育系統除留下不到 1/10 的幹部外，其餘全部下放勞動。體育器材被銷毀，運動場地被破壞，改成倉庫、菜地和豬圈，游泳池改成了化糞池、積肥坑。

體育界開始進一步清理隊伍，容國團被要求寫檢查，質問他為何要寫請戰書。這就意味著容國團失去了出國比賽的機會。同時，噩耗傳來，傅其芳和姜永寧相繼自殺，容國團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他十分迷茫，不斷詢問隊友：「你覺得我們有錯嗎？」容國團想不通，傅其芳熱愛祖國，怎麼可能是潛伏的「奸細」？而自己呢？當年香港許多俱樂部都想招他入隊，日本也向他發出了邀請。他義無反顧，投入「新中國」的懷抱，還入了黨。憑什麼說他是特務？

因為請戰信，容國團被批為「修正主義」，被「體委紅旗」和「清中紅衛兵」揪斗、侮辱和毒打。他的罪名包括：是賀龍、榮高棠黑幫的鐵桿保皇派，參加了「反革命特務小集團」（因其與幾名國家教練姜永寧、傅其芳、王傳耀等人有時一起吃飯）。此外，1957 年，廣東省體委爭取他回廣州參加廣東隊時，體委辦公室通知深圳海關，不用檢查他的行李。紅衛兵專案組又藉此懷疑他偷運武器入境，因此他的家也被搜查搶掠。還有，容國團愛看外國小說，愛聽外國古典音樂，懷念香港，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腐朽生活」的崇拜者。

容國團被關押在廁所寫「揭發交代」，內裝大喇叭拉線至專案組。紅衛兵們玩完一輪麻將後，便對著「麥克風」喝令他「老實交代」。就這樣，從早到晚精神虐待，有時還把他拉去審問，有時拳頭相向。容國團痛苦不堪，他不知道，下一次批鬥時，等待自己的又會是什麼。

容國團留下的遺書上寫著：「我不是特務，不要懷疑我。我愛我的榮譽，勝過自己的生命。」容國團被指因反革命而畏罪自殺，雖然未以此定論，但結果是，他沒有葬禮，火化費由其家人、並用他自己的部分工資承擔。

1978 年，中共為容國團「恢復名譽」，並補開了追悼會，後來還評選其為最傑出運動員之一。



▲ 1961 年 4 月 9 日，中國男子乒乓球隊捧得「斯韋思林杯」。教練傅其芳（左四）與榮國團（左三）、姜永寧（右一）等隊員合影。(資料圖片)

2 姜永寧 (1927—1968)

姜永寧是廣東番禺人，出身貧苦，在香港揀煤渣長大。1952 年回國後，他獲得了全國首屆乒乓球錦標賽冠軍、第一屆全運會冠軍。姜永寧一共參加了四屆世乒賽，為中國隊晉級世界四強立下汗馬功勞，他也是第一個打破世界冠軍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1963 年，姜永寧調任北京隊總教練。他是中國乒乓球運動的奠基人之一。

北京市體委專案組的七八個人闖進了姜永寧的家。他們先是大聲「什麼人站在反革命立場就是反革命派」的語錄，接著向姜永寧的妻子孫梅英宣布，姜永寧已被專政。專案人員胡亂抄家，抄走了一包照片。

在一張姜永寧少年時代的照片上，他們發現，他的衣服上有個小小的太陽旗。因此，專案人員逼迫姜永寧承認，他是「日本狗特務」。姜永寧一再解釋：「那時賣的衣服常有太陽旗，我和日本人沒有任何往來。」但是專案人員根本不理睬他，幾個壯漢抄起棍棒，對著姜永寧劈頭蓋臉一通亂揍。

5 月 16 日清晨，好友王錫添看到了他腫脹的臉，小聲問他：「他們打你了？」姜永寧搖搖頭，不敢說出實情。那天，在先農壇宿舍

樓，姜永寧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掃的廁所擦得乾乾淨淨，然後獨自走進四樓的一個房間裡。人們回來後發現姜永寧失蹤了，便四處尋找。這時，王錫添看見姜永寧站在窗口，以為他要跳樓，含著眼淚大喊：「姜永寧，你不要想不開，不要做糊塗事。」可是，姜永寧紋絲不動。人們打破玻璃跳進房去，發現姜永寧吊在窗口，已經斷了氣。

姜永寧離世後，孫梅英也被扣上了「特嫌、漏網右派、反革命家屬」的帽子。除了挨鬥，她還要寫檢查，忍辱負重。孫梅英後來告訴女兒小英，在被關押期間，她挨過打，有一次因為不承認是「資產階級」，差一點被幾個年輕人活活打死。在艱難的日子裡，孫梅英想到兩個年幼的女兒，便強忍痛苦，堅持活下去。

姜永寧是大家公認的老好人。他生活簡樸，喜歡攝影、讀書和看報。他工作刻苦，沉默內斂，與世無爭。他被調到北京體委後，每天五點半起床，六點半便到達訓練館，從輔導隊員到打掃衛生，從示範動作到給小孩子當陪練，他都幹得盡心盡力。入夜，他還要撰寫訓練計劃。他善良熱情，觀眾來信詢問打球事宜，他有信必覆；邊防戰士希望得到一把好球拍，他幫助購買後釘在木箱內寄出。

當文革的狂風吹進先農壇體育場時，姜永寧的名字出現在「大字報」上：「揪出日本大漢奸姜永寧」，「姜永寧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漢奸，解放後他迫不及待地回來，這一切值得革命群眾深思」。姜永寧驚呆了。

據姜永寧的女兒姜小英回憶，「北京體委的領導連連被批，坐「土飛機」、剃陰鬚、搨耳光、順著頭頂灌紅、藍墨水的場面我都親眼見過，可我萬萬沒有想到已是北京體委黨委成員又總是沉默寡言、兢兢業業的父親也會被這場狂潮捲了進去。」



▲ 姜永寧生前與女兒姜小英留下的最後一張合影。(資料圖片)

4 結語

傅其芳、姜永寧和容國團都選擇了「新」中國。一心向「黨」，他們奉獻出青春、才華和赤誠。最終，他們被「黨」發動的鬥爭批倒、誣陷，含冤而死。許多年後，大陸乒協設立了「三英杯」乒乓球友好邀請賽，以紀念這三位乒乓球元老。然而，人已離去，空留遺憾。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惡浪中，千千萬萬善良的生命被淹沒吞噬。十年

「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砸碎了無數文物古蹟，多少科技文化界、音樂界、體育界、藝術界的精英慘遭迫害。自殺的悲劇潮，由中共暴政催發。受難者熱愛生活，鍾情事業，卻承受不住「運動」的重壓。他們告別親人，含恨而終。悲劇，不斷地重演。今天，暴政體制猶在，悲劇，如何結束？

一代英傑，熠熠生輝，命斷紅潮，何其哀也。◇

共產黨百年真相



王實味

一提到野百合花，容易想到王實味。王實味因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招來了殺身之禍。野百合花象徵純潔、質樸和草根性，王實味的悲劇令它染上了血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苦難的象徵。

■ 本版撰文：玉清心

今年是王實味遇難 70 周年。在中共歷史上，王實味不是第一個被冤殺的知識分子，但他卻是延安整風運動被拿來祭刀的第一人，他是中共延安整風運動的犧牲品。

王實味 1906 年 4 月生於河南潢川，父親是前清舉人，在家鄉辦學，家境清貧。他幼年隨父親熟讀了四書五經，有較深厚的國學根底。1925 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學，和胡風同班，後因經濟困難，只讀了兩年，1926 年 1 月他加入了中共。1930 年和北大同學劉瑩結婚，生有一雙兒女。

1 才華橫溢

1926 年，王實味在北大上學時，已在《晨報》副刊、《現代評論》、《創造月刊》、《新月》等赫赫有名的報刊上發表過多篇中、短篇小說，受到了詩人徐志摩、評論家陳西滢等的重視，《現代評論》還破例給了他三十元稿費，這件事會被傳為文壇佳話，甚至載入了文學史中，那時他不過二十出頭。

1930 年，他的中篇小說《休息》被編入「新文藝叢書」，由中華書局出版，這套叢書中包括了沈從文、胡也頻、徐志摩的作品。他還翻譯過不少西方文學作品（如都德、哈代、高爾斯華綏等人的作品）。早在 1933 年 9 月出版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就提到了他的文學創作。

2 投奔延安

1937 年，31 歲的王實味經範文瀾介紹投奔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的馬列學院編譯室，參與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他個性耿直，看不慣頂頭上司陳伯達頹上壓下的嘴臉，導致和領導關係緊張。但三年間，他參與了大量對馬列著作原作的合譯與單譯，有一兩百萬字。他的很多譯作直到中共竊國後還在再版。當然，那些譯作上早已沒有他的署名了。

1941 年 9 月，馬列研究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王實味轉入中國文藝研究室作特別研究員，不再翻譯外文著作，開始寫文章。

3 發表《野百合花》

1942 年 3 月，王實味將自己對延安生活的感受，寫成了五千多字的雜文《野百合花》，分兩次發表在《解放日報》副刊上。同時，他在《救國》刊物上發表了《政治家、藝術家》一文。同月，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風牆報《失與的》上，貼了幾篇針砭延安時弊的文章。

他的文章發表後，在延安引起轟動。

北大才子王實味和他滴血的野百合花

動。毛澤東曾深夜提著馬燈去看《失與的》壁報上面王實味寫的短文。1945 年「七大」時毛說：「四二年，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

《野百合花》裡，王實味寫道，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青年懷著抗日熱情來到延安，卻發現延安中央大禮堂的舞會在通宵達旦地舉行，一派「歌嘯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歌舞昇平景象。

短文裡表達了他樸素的人性觀念，這些應該與他的家教、北大學府的教育及他在西方文學方面的造詣有關。他追隨馬克思主義，但不真懂，他把他們理想化了。他經常說「史達林人性不可愛」。骨子裡，他沒有放棄最基本的對人性善良的追求。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太強調客觀、太看重物質，以為改變了客觀的物質條件，人性就能夠變好」，其實未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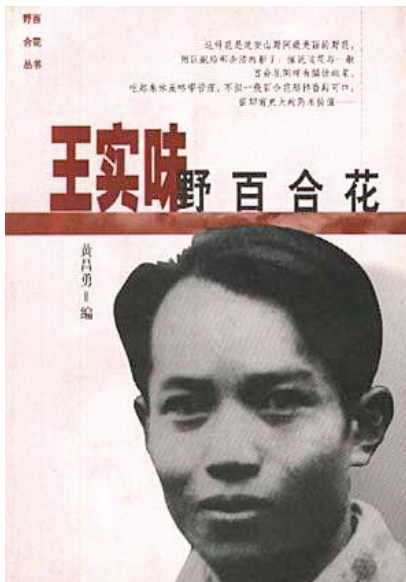
他的真話，在延安知識分子中引起共鳴，他的勇敢，在鼓舞大家也暢所欲言。王實味的工作單位中央研究院，有 95% 的人都支持他的觀點，對陳伯達這樣的領導發起批評。延安大學也出現了民主「一邊倒」的局面。各學校、機關紛紛仿效，辦起內部刊物，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

據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讀完《野百合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地說：「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毛當即給丁玲任主編的《解放日報》打電話，要求他們作出深刻檢查。

胡喬木曾兩次和王實味談話，還兩次給他寫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錯誤。對這一明顯來自毛的批評意見，他置之不理。其實，王實味當時只要低頭認罪，學學丁玲、艾青他們，把自己作踐、糟蹋一番，也許就能逃過這一劫了。

4 被選定作靶子

毛澤東感到問題嚴重，擔心剛開始的整風運動變調失控。於是，毛改變了原先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的策略，決定拋出王實



▲ 王實味因一篇敘寫延安生活感受的雜文《野百合花》被殺。圖為大陸近年出版的王實味文集書影。(資料圖片)

味作為靶子，先將反黨的「自由化思潮」打壓下去。

3 月 31 日，《野百合花》發表後一個星期，毛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發出嚴厲警告：「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 4 月 2 日《解放日報》的頭版上。

4 月 3 日，中宣部發出有名的「四三決定」，即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針對中研院整風出現的「自由化」傾向，特為「糾偏」而制定的。「四三決定」結束了短暫的延安之春，整風不久就轉入了嚴酷的「審幹肅反」階段。

4 月 5 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再次重複毛澤東 3 月 31 日發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擊王實味是「從不正確的立場來說話」，譴責王實味等的「錯誤的觀念，錯誤的辦法」。

4 月 7 日，中央研究院開始了對王實味的批鬥。院內原先支持、同情王實味的 95%，很快變為他的對立面。他們被嚇得不知所措，紛紛反戈一擊，或痛哭流涕檢討自己立場不穩，上當受騙，或義憤填膺，控訴王實味一貫「反黨」、「反領導」。一些人甚至做出與王實味「勢不兩立」的模樣，要求組織上嚴懲王實味。

5 開除黨籍 被捕坐牢

6 月 2 日休會一天時，王實味找了中央研究院黨委負責人，提出要退黨，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但是，他太天真了，黨組織絕不會給他這種自由，而是要將他開除出黨。

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不想就這樣放過死不認錯的王實味。他捏造出了一個包括王實味在內的中央研究院潘芳等人的「五人反黨集團」。10 月 23 日，罪名上報並由毛親自批准，作出了《關於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說「王實味是一個隱藏在黨內反革命分子」。

1942 年年底，王實味被隔離審查；1943 年 4 月 1 日，康生的中央社會部正式逮捕了王實味，將其關進了社會部看守所。一段時間後，一貫拒絕認錯的王實味，突然胡亂承認自己是託派中央委員兼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還參加過託派的「十月社」等。審訊他的人說，王實味腦子出問題了！

他的消息傳出來後，中共為了「關謠」，放王實味出來見外面的記者。記者問他說：「你最近做什麼事情呢？」王實味非常謙虛地說：「我在糊火柴盒子。」記者說，「我在他眼裡面、眼神當中看見了無數的恐懼，看見了巨大的恐懼。」這就是後來的王實味。

6 慘死

1947 年 3 月，因國民黨胡宗南部進攻延安，已被囚禁了四年多、身患肺病的王實味也由中央社會部兩名幹部押送，隨中央機關撤離。4 月 16 日，到達山西省興縣，晉級公安總局主管審訊與看守所工作的第四科就設在那兒，王實味被移交給這個看守所。

6 月 12 日，看守所被飛機炸毀。對王實味這個中央級要犯該如何辦？駐在臨縣的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與副部長李克農接到報告後批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

1947 年 7 月 1 日晚，一個手提砍刀的年輕幹部走進一孔小窯洞，拖出一個幹部模樣的中年人，拉到偏僻處，手起刀落，殷紅的鮮血噴灑到乾硬的黃土地上，染紅了野百合花……死者是王實味。因怕被人認出，他被亂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屍體被丟在枯井內。

7 月 1 日是中共建黨日。嗜血成性的中共，偏選在那天殺害王實味。當年為整風運動拿他祭刀，摧毀扼殺了他的全部心智。這還不夠，最後用他的生命為黨慶做了祭品。王實味 19 歲入黨，31 歲到延安，41 歲被中共殺害。

王實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劉瑩全然不知。中共建政後，她四處尋找丈夫。得知人已經被處決，她確信王實味是被冤枉死的。多年來她和兒女不斷向中央寫申訴信，多次到北京上訪。1962 年李克農臨終前向劉瑩承認，「王實味案」是糾纏他多年的一塊心病。當年也落井下石的李維漢，還參加過託派的「十月社」等。審訊他的人說，王實味腦子出問題了！

生命已逝，平反有何用？在「延安整風」中，一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和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被整死了。中共整人，恐怖到把人整得「求生不能，求死不能」的地步，不少人跪下來磕頭求饒都難免一死。王實味這樣的悲劇，後來一直在不斷上演，至今沒停。◇

多少「逃港」知青魂飄大海

從中共 1949 年建政，到 1997 年香港主權回歸，每天都有逃港事件發生。每次逃亡高潮，都出現在中共政治動盪大開殺戒或經濟危機民不聊生的時期。文革期間的「逃港」，曾有過一天逃港 7 萬人的「井噴」紀錄。文革逃港潮的 1971 年—1974 年期間，知青是主力軍。

《偷渡香港》作者陳通教授於 1979 年冒死逃到香港。據他調查統計，70% 的逃亡者是失敗的，20% 的逃亡者死在路途中，只有 10% 的逃亡者有機會成功到達香港。

他說，最保守地估計，當一個人成功逃到香港時，至少有一個人死在逃途中，還有許多人逃亡失敗被抓捕毒打、批鬥關押、勞教勞改、被槍斃、被餓死、被迫害致死或自殺。有二百多萬人成功偷渡香港，三百多萬人死在偷渡路上，兩千多萬人參加偷渡香港這一行列。

當年有多少知青捲入這場偷渡潮？又有多少人葬身魚腹？據民間調查，在廣州老三屆知青中，全班百分之百捲入偷渡潮的都有。每個班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以此類推，全廣州一百多所中學，該有多少人？他們歷盡千辛萬險，屢試屢敗，屢敗屢試，冒死投奔自由世界。

陳秉安在《大逃港》中提到廣州培英重點中學，那是座百年名校，師資力量雄厚，培養了大批優秀學生。但 1968 年，將近 80% 的初高中

生，約有千人都不得不上山下鄉。這些學生下鄉兩年後，1971 年開始了大規模的知青逃港，匯入「知青偷渡潮」。

偷渡的慘烈

「1974 年 8 月，第五次偷渡終於成功。游水五個鐘頭之後，我們三人在平洲島上岸……員警將我們一共十七八個偷渡客送上船，從平洲島到香港島要走三四個鐘頭。中途所見，永世都記得。如果之前見過，我一定不敢偷渡。——當時成海都是死屍，船走一段就見幾件，好多好多，不是一下子好多，是這邊幾件，那邊幾件，在水泡（註：粵語指救生圈）圍圈中間，剩得個上半身，頭在水泡上，下半身已經被魚吃了。周圍海水「紅撲撲」。我們那條船船員說撈一件看是怎樣死的？撈上來，膝蓋以下已經斷了，還吊著皮……同船還有幾個女的，說原來和她們一起有男的已被鯊魚吃了，有的是咬斷腳後流血死的……」

上面這段表述，來自一名逃港知青的親身經歷。知青死於偷渡的確切人數雖然至今不知曉，但其慘烈過程有很多親歷者。上面這段口述歷史記錄，或許也已經對死亡數字做出了大概率的描述。

活不見人 死不見屍

據和失蹤的梁啟光同住一茅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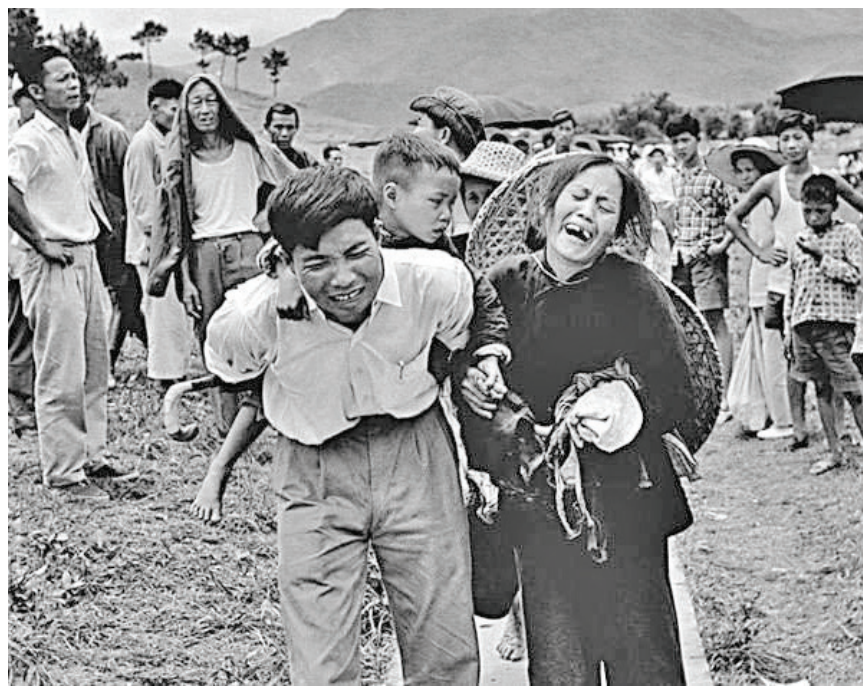
房的知青回憶：「那天他們四個在我這裡吃飯。梁城根不是我們隊的，在東瓜宇大隊。我隱約知道他們是商量偷渡。吃過飯後他們就動身了。大約過了半月，快過年了，梁啟光的姐姐到我這裡來找弟弟，說她家在香港沒親戚，應該不會是……我說那天你兩個弟弟在我這裡吃完飯就走了。」

「送她姐姐一出門，她就大哭，說現在沒有一點音訊……其實，梁城根的母親也一點都不知道兒子走了，以為他還在農村。以後聽說是颱風翻船死的，都沒有辦法證實，不過我記得他們走的那天晚上是起風了……」

另一同學趙玉琦回憶：1973 年的 7 月，偶遇沙螺灣大隊民兵營長劉金喜，他問誰叫梁成根？原來，一年多前，劉曾接到寶安縣的通報，說在一具知青的屍體上找到一張「南沙公社東瓜宇大隊」的證明，屍體是被寶安漁民的拖網船撈到的，然後就扔到寶安護沙堆埋葬了。

在突然起風的那個夜裡，有四條年輕的生命，消隕在茫茫大海中。四十多年裡，親人們始終在苦苦尋找，等待他們突然歸來，因為無法接受「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然而，他們的母校早把他們忘乾淨了。現在廣州培英中學有漂亮的校史館，但校史上對當年老三屆的偷渡和死亡不著一字。



▲ 1962 年 5 月大逃港的一張經典照片。港府受不了狂潮般的逃港客，大量遣返返大陸。被遣返回鄉的一家人痛哭。(資料圖片)

當年廣州「老高三」知青黃東漢說，逃亡的路上很多知青死了，或摔死在懸崖峭壁下，或慘死在槍口下，更多的是葬身茫茫大海中。當年偷渡死亡的數字是多少，恐怕只有天才知道了！但肯定不會是個小數字。

1978 年夏從汕尾出發的一條小木船在大亞灣沉沒，45 個年輕人無一生還。黃東漢說，他有一個小學同班同學，和一個街坊一同葬身大鵬灣。1973 年 12 月裡，從碎石斜坡滾落下來的胡向坤甦醒過來時，發現 10 米外的兩個同伴早已氣斷身亡……

逃港知青說，我們不是英雄，

是被坑害的一代，悲哀的一代。我們本該升學讀書，追求理想，卻被迫「起錨」、「撲網」、「蹈海」。我們的青春如同一場噩夢，不堪回首。

一群「偷渡知青潮」的倖存者，在吉澳島為逃港死難者立了紀念碑。那一起起「逃港」潮，一個個在逃亡過程中消逝的生命，記錄下的是中共暴政帶來的苦難。

碑址選在了逃港中喪命最多的大鵬灣沙頭角岸邊，以紀念那些消失在漫長夜路和冰冷海水中的逃亡者，那些魂飄大海的青春夥伴：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夢化，一縷輕煙。◇

共產黨百年真相

浸血的反右

「反右運動」是中共於 1957 年發起的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的大型政治運動。當時中共鼓勵人們「言者無罪」「大鳴大放」，許諾「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結果一場反右鬥爭抓了 55 萬名右派分子。毛澤東稱之為「陽謀」。

反右運動——浸血的世界紀錄

■ 文：高天韻

2008 年，一部四卷、120 萬字的《五七右派列傳》問世。該書秉承「釐清真相，還原歷史」的原則，共有四百餘篇傳記，涉及 1,318 名右派（含少數中右），重點介紹大陸各界、各路右派的劃右原因及受迫害經歷。作者申淵，本名陳榆林，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1956 年加入中共，1958 年在反右補課運動中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放逐內蒙古邊疆勞動。

上千個右派的悲慘故事，深刻揭露了「反右運動」的殘酷和中共的邪惡本質，其中被劃為「右派」的青少年所受到的摧殘，令人震驚又震動。一名又一名被定性的年輕人，在錯愕中，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被發配勞教，有的從此邁向一條不歸路。

中共發動的這場運動，被指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波及了數百萬中國民眾。它所創下的黑色世界紀錄，飽含生命的血淚、透著靈魂的哀歌。

2 「噩夢醒了嗎」——李日垓

雲南省昭通市的李日垓，1941 年 12 月 23 日出生，剛滿 16 歲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作為一名少年思想犯，從 1958 年元旦過後到 1978 年底，李日垓總共渡過了 20 年零 8 個月的勞改歲月，期間三次遭逮捕入獄，長期戴腳鐐手銬，曾關在單人牢房。有關他的檔案材料多達 300 萬字。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龍曾前往昭通採訪李日垓的案情，在查閱其檔案和訪問有關人員後，寫出了報告文學《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

作者寫道：「李日垓始終不知道自己犯有什麼錯誤，過了二十年後平反昭雪時，才知道自己有什麼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可是，這些言論，都是當時在整風中響應黨的號召，在本單位負責人多次動員下說出來的，是符合實際的，是一個純樸的公民向黨進忠言……」

李日垓是一個「紅小鬼」。他

13 歲參加「革命」，後擔任昭通市專署機要員。1958 年元旦過後，16 歲的李日垓被專署「下放勞動鍛煉」。他背著行李，在冰雪中步行五天，趕到 300 里外的彝良縣大坪農場報到。到達時，場部管理人員告訴他：「你是右派，編入右派分子勞教小組，明天出工。」李日垓聽了大吃一驚，自己怎麼會是右派分子呢？一個月後，他從農場逃跑，打算走路進京申訴。可是，他只走出了幾十里，就被抓了回去。幾個月後，他又被捕、判刑六年勞改，刑滿後仍長期被囚禁，整個文革期間都關押獄中。

李日垓恢復自由後，在網路發表專集《噩夢醒了嗎》。他寫道：「而且直到今天，我並未得到言隻字的處理通知書，但殘忍的無期徒刑待遇卻實實在在耗去了我 21 年的黃金華年。這是真正的殺人不見血。」

李日垓剖析指出，「反右」是

暴力體制毒素分泌的必然，而非此運動染黑了體制。「五十年實踐檢驗，代價慘重而結論清楚，反右這場人禍是一起國家犯罪，也就是說，犯罪者利用國家機器來作案，大規模誣陷和殘害公民，從而把中華民族隔絕於人類主流文明之外。由於惡果嚴重威脅到民族存亡，反右災難在延伸 22 年之後才作了『半否定』，用不具備法理依據和政治內涵的『改正』二字來代替平反，特別是踐踏憲法第 41 條而不作善後處理，公然在道義上和法理上賴帳。反右的維護者自己不敢正視歷史和坦白歷史，又最恐懼人民從噩夢中醒來。但是原生態的史實證明，反右是一個跨越半世紀時空的系統工程，是暴力社會主義這個制度本身註定要採取的外在形式。並不是反右的一次邪風惡浪浸黑了這個政權，而是暴力政治體制所固有的毒液分泌出了反右運動。」

3 反右——浸血的紀錄

著名學者胡平在《1957·苦難的祭壇》指出：「反右運動的實質是有組織的國家犯罪，是利用國家權力對公民實施誣陷直至剝奪人身權利和拘禁。」

2009 年 1 月 15 日，李日垓的「給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公開信」在網上發表。文章指出，「反右」是人類歷史上大規模的文字獄，作者並且探討了「反右」運動欠帳的法理認定和解決方法。

李日垓寫：「精神奴役、人格凌辱、超負荷勞役的摧殘、累死、餓死、凍死、捆死、吊死、工傷、毆打致死、分化互殘、強迫離婚、逼使自殺等手段在全國各地右派集中營成為普遍現象，整死整殘的人數和精神傷害程度超過德國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多少倍？這是一個無法回避世界歷史考證的嚴峻課題。」

有關「反右」所迫害和波及的人數，作者引用了幾組資料，得出驚人的結論：「官方公布：有公職的右派 552,973 人，1979 年『改正』了的 552,877 人，整錯者竟達 99.98%，而又故意留下 96 人不予改正，用以維持反右總指揮 1979 年講的那句『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的荒唐邏輯不准反駁。但這 96 人究竟有何滔天之罪，又不敢向國人公布。」

2008 年，《五七反右列傳》的著者陳榆林對大紀元記者表示，他之所以要寫右派歷史，就是為了揭穿中共的謊言。「共產黨害怕的不是



▲ 12 歲的張克錦曾為鄰居的大字報配了一幅漫畫而被劃歸「右派分子」，入獄七年。圖為天津工人在「鳴放」運動中貼出的大量大字報。(資料圖片)

小罵它，它害怕的是說清真相。因為中共的政權建立在謊言和欺騙的基礎上，最可怕人揭穿謊言。」陳榆林認為，右派數字不止官方公布的 55 萬，他的估計是約有 120 萬人。

《五七反右列傳》還破了另一項紀錄——「右派分子」的年齡下限。原來，年紀最小的「右派」既不是佟信順，也非李日垓，而是四川達縣一位五年級的小學生張克錦。當年，12 歲的張克錦為鄰居的大字報配了一幅漫畫，鄰居被劃右後跳橋自殺，而這個小畫童經領導認定，冠以「右派分子」。1958 年，張克錦被送獄七年。1979 年，一份「改正通知書」送達至他曾就讀的那所小學，為他的「右派」生涯劃上了句號。

陳榆林說：「雖然我已經沉默了

將近五十年，我看到我的前輩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威賽爾和蘇俄布拉格群島的倖存者索爾仁尼琴，為歷史留下的見證，我還有理由猶豫和逃避嗎？難道我要把這些刻骨銘心、震撼人心的故事帶進焚屍爐嗎？」

陳榆林表示，共產黨的做法掩蓋真相，試圖讓人們忘記過去，「共產黨認為你人很計較，大家忘掉算了，現在生活怎麼好，這就等於容忍他們重複犯錯誤。他們為什麼要封殺我這本書？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大家都明白真相，它的基礎就垮臺了。」

暴政的罪惡和歷史的沉重，由於諸多倖存「右派」和學者的勇氣，得以曝光世間。今天，不幸的是，相似的悲劇仍在上演，更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還在持續進行著。◇

1 佟信順——向美國總統問民主



▲ 中共 1957 年發起反右運動。(維基百科)

佟信順 (1941—1960)，北京人，家庭出身三代都是工人，根正苗紅。初中畢業後，佟信順進入北京冶金中等專業學校學習。1957 年整風鳴放開始，佟信順出於好奇，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寫了一封信，請教他美國的民主是怎麼搞起來的。結果，就因為這封信，他被扣上「極右分子」的帽子，被押進了北京半步橋第一監獄，然而再送到茶灘農場進行勞教。

在茶灘農場，佟信順被編在趙文滔的小組。趙文滔是北大的學生右派，作為「犯人」擔任小組長，給予 16 歲的佟信順不少關照。趙文滔在其長篇回憶錄《傷害》裡，記敘了佟信順的遭遇。

「剛進入勞教農場，犯人要自報身分，讓管教幹部和其他犯人了解自己、監督自己，便於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佟信順自我交代自己的罪行說：『信擱郵筒了，不知怎麼搞的，信又回到了黨支部書記那兒了。書記說，就憑你給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頭子寫信，就能打你個極右分子，便把我送到這兒了。』他一片茫然，始終不明白出了什麼差錯兒。」

1960 年，佟信順被調往別的小

組，與關照他的趙文滔、劉佐漢分開了。「大饑荒」發生半年後，有一天，趙文滔在收工的路上看到了小佟。「他看到我以後，兩腿艱難地快走了幾步，趕到我身旁嘔嘔而結巴地說：『我，我，我餓，餓得晚上睡，睡，睡不著，兩腿都不聽使喚了，走，走道都走，走不，不，不動了，我，我……』我回頭瞥了一眼，這是那個孩子嗎？今年應該是 18 歲了，該進入成年了，怎麼還是那麼矮小？……棉帽子的兩個護耳隨著走步，像兩隻翅膀，有節奏地扇動著，『翅膀』中間是一張小小的消瘦得只一層乾癟老皮的臉龐，顴骨突起，兩腮陷下，面色黃綠，跟餓殍一樣。說話間已經感傷得泣不成聲。」

在這次見面後大約一個月，小佟倒下了，再也沒有起來。他的哥哥前來收屍，「哭得非常淒慘，反復哭喊著一句話：『他還是個孩子呀，他還是個孩子呀……』」

趙文滔寫道：「是的，他還是個孩子！孩子也被網進了『陽謀』政治惡網。還沒有成年，勞教了兩年，就被『餓刑』殘酷地輕取了他的生命！」

命喪「反右」運動的胡適之子

■ 文：林輝

胡適，民國時期著名的國學大師，曾在北大學任教，1938 年至 1942 年抗戰期間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其在學術和政治上的影響都不可小覷。由於追求自由思想的胡適沒有選擇留在大陸，而是去了台灣，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他成為中共大規模批判的主要人物。

胡適育有三個孩子，長子胡祖望、長女胡素斐，次子胡思杜。生於 1921 年 12 月 17 日的胡思杜，年少時患過肺病，因此讀小學時時讀時輟。胡適為此曾請自己的學生羅爾綱做其家庭教師。後來他重新入校讀書，但並不屬於聰穎那類的學生，而是喜歡交朋友和玩樂。

在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期間，胡祖望於 1939 年、胡思杜於 1941 年先後赴美讀書，胡思杜選擇修讀歷史。1948 年，當他與父親的朋友一同回到北平時，許多人看胡適的面上，紛紛邀請其到北大學任教，但胡適以「思杜學業不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鄧廣銘語）為由拒絕了所有邀請，只同意他到北大圖書館工作。

1948 年 12 月，蔣介石派飛機到北平接胡適等文化名流。來使告訴



▲ 1948 年胡適江冬秀夫婦與二子胡祖望（後左）、胡思杜（後右）合影，胡適時任北大校長。(資料圖片)

胡適，這是南下的最後一次機會。對中共沒有甚麼瞭解，但自認為沒有做過對其有害的事情、不會被其怎樣的胡思杜決意留下，而不是隨父母南下。胡適的妻子江冬秀雖然難過，但也無可奈何，只好給兒子留下了一些細軟和金銀首飾後離去。

1949 年 9 月，胡思杜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學院學習。次年 9 月 11 日，胡思杜致信給在美國的母親，告訴了華大畢業之事，信

中說：「我從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學教書，那裡有不少熟人，學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你別掛念。」信中還盼父親胡適少見客、多注重身體。

1951 年，中共為了加強對思想控制，開展了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在運動中，胡思杜違心地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台演出反美話劇。此外，他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

胡適的批判》一文，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胡思杜的「叛逆」之舉在海內外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消極影響，而胡適卻不願多談此事。

在「學習改造」結束後，胡思杜還將母親留下的細軟上交給中共，「向黨組織表示他的忠心」，並表示要加入中共。可以說，在唐山工作期間，胡思杜一直認真努力地工作，希望以此為父親「贖罪」。

胡適在 1950 年 10 月 7 日的日記中曾記述來自朋友的消息：思杜有一個女朋友，現在貴州，明春可能回來，希望他明年能結婚。然而，大概迫於壓力，這個女朋友最終與其分手，此後再無人願意與思杜談戀愛。

1957 年，為了徹底消除知識分子的不滿之音，毛澤東採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讓知識分子自由發表看法，給中共提意見。一些知識分子上當，這其中就包括想入黨的胡思杜。他主動給他在院、部的領導提了不少建議。隨著中共反擊右派的開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說其是向黨進攻，並將其父親胡適一齊批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於當年 9 月 21 日上吊自殺。在其親戚胡思孟接

到學校打來的電報趕到唐山後，「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適的」。學校告訴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殺」，並給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遺書」。此時胡思杜已經被裝到棺材裡，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個坑，把他埋下，立個小木牌，「現在恐怕也不知在甚麼地方了」。

料理完後事之後，胡思孟便把胡思杜的書和衣物裝了一架手車託運回北京。文革期間，擔心紅衛兵抄家，胡思孟將大部分書都燒了。那份「遺書」的稿件也被撕掉了，只保存下紙的一角。

1962 年，胡適在台北病逝，至死都不知次子離世的消息，因為在他生前，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慘結局告訴胡適夫婦。如今，在胡適夫婦墓地的東南側，有一塊胡祖望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約四平方米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紀念碑。胞兄祖望勒石。」

1980 年，胡思杜被中共當局以錯劃右派「平反昭雪」。地下有知的胡思杜對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中共會作何感想呢？◇

大饑荒紀實

1959至1961年，一場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飢荒劫難降臨中國大陸：幾千萬中國人死於飢餓，各地上演著「人相食」的人倫慘劇。這場由中共一手製造的「人禍」，至今仍是大陸官方極力封鎖的歷史。

大饑荒紀實

中共三年人禍致死四千萬人

1 大饑荒紀實

楊繼繩傾盡十多年的心力調查研究並完成了約100萬字的巨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他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蒐集大量翔實的文獻資料，採訪了上百位當事人，包括當年的大小官員、饑荒的倖存者及見證人，記了10多本訪談錄。

書裡的資料都是內部資料，檔案、會議記錄及各種地方志、縣誌。「我當時是新華社高級記者，以採訪中國農業政策的演變的名義，通過新華社分社各個社長幫忙，跑了12個省的檔案館和中央檔案館，複印、手抄了幾千萬字的資料。」

其間的艱辛難以言狀，費盡了周折，有的地區還是不讓看。他兩次到通渭，都沒能進入通渭檔案館。後來經高層朋友的幫助，他在甘肅省檔案館才看到了70%家庭有死人的通渭檔案，在河南省檔案館看到100多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信陽檔案。他看到很恐怖的資料，在攝像頭下抄寫了8個本子，有的資料審查後再到他手裡已抽走幾頁。不管怎樣，他還是抄閱和複印了數千份原文件。

他反覆查證，數易其稿，以史筆之心與新聞記者的良知，以大量的事實、詳細的考證和數據，再現了這段慘絕人寰的人間痛史，揭穿了長期以來官方「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的謊言。

1960年7月，蘇聯撕毀了600份技術合同，撤走專家，其影響局限在國防尖端和一些重工業領域，與農業生產毫無關係，那時大饑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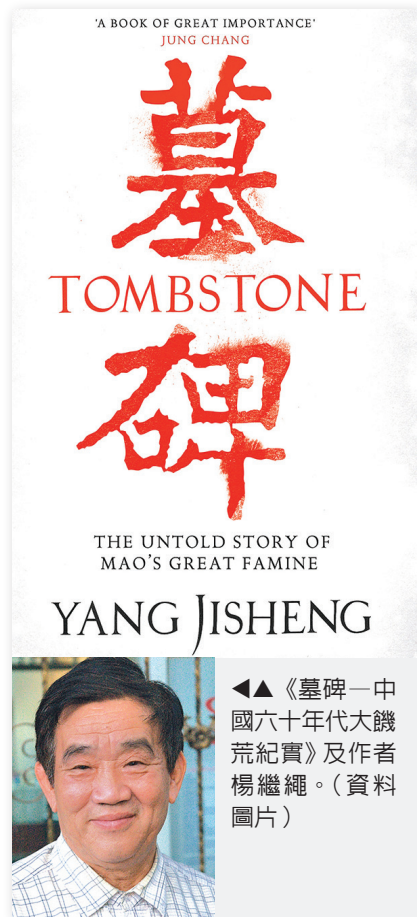
已經發生了一年多了。蘇聯六一年3月以貸款的方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蔗糖，中共不要小麥，只接受蔗糖援助。沒有蘇聯逼債這回事，是毛澤東為「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了債務。

楊繼繩五次到國家氣象局查資料並求教氣象專家，結論是那三年是氣候正常的年景。

這場慘烈的大饑荒，非「天災」而是「人禍」，根本上都是極權制度造成的，是中共「跑步奔向共產主義」的大躍進、大修水利、大煉鋼鐵、人民公社、浮誇風、公共食堂等一系列違反自然規律、違反民眾意志的政策造成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虛報誇大糧食產量，導致徵糧過重。所有的財富、資源、土地都被政府壟斷，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其次，要出口農產品換回工業生產用的機器。

更苦不堪言的是，折騰農民大規模煉鋼，把鐵犁、鐵鍋等砸了煉鋼鐵。青壯年都投入煉鐵和修水庫，耽誤了農時，莊稼來不及播種或收割，大片田地荒蕪。糧食大量減產，各省卻「喜報頻傳」，陷入「歉產萬斤」的吹牛狂歡。公共食堂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誰不聽話就不給飯吃，「扣飯」是普遍現象。

一些地區農民想開荒種地、在自家吃飯也不行，自留地收歸集體，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裡的煙肉不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及作者楊繼繩。(資料圖片)

許冒煙。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一種消滅私有制、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強大政治聲勢。

最不可饒恕的是：在糧庫裡有大量庫存的情況下眼看著農民餓死；在上千萬農民餓斃時卻大量出口糧食，僅1959年援助「社會主義小兄弟」的糧食就達416萬噸；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總額為35.5億元；在廬山會議上批判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不但沒

有開倉放糧，還更瘋狂地搞大躍進、刮共產風，繼續超限度強行徵糧，宣傳形勢一片大好。

由於反右傾，幹部們為自保不敢說真話，完不成徵糧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挨批鬥。於是層層施壓、不擇手段地逼迫上繳糧食，把農民僅有的口糧、種子、飼料搜刮一空。捆綁、吊打、拘捕等現象屢見不鮮，草菅人命。

公共食堂的「大鍋飯」越來越稀湯寡水，後來變成有一頓沒一頓，漸漸也不開伙了，幹部能弄到吃的，老百姓可就慘了，飢腸轆轆，餓得皮包骨，或得了浮腫病，哪還有勁兒出工勞動？走路搖搖晃晃，頭昏眼花，很多人一頭栽下去，就再也沒起來。

在全國實行的專制統治也阻斷了民間自救之路，各地嚴防死守，設立「檢查站」，民兵持槍攔截饑民逃荒要飯，認為這是給社會主義抹黑，被毒打虐殺者眾。可憐的農民只能坐以待斃，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泥土都用來填肚子。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交待說，全地區被抓進監獄的吃人肉者「上千人」。

虎毒不食子，然而在60年代初的大饑荒，像轟動一時的湖南澧縣劉家遠殺子食子案，絕非個別現象。楊繼繩在書中記敘了多起吃親生兒女的事件。毛澤東前秘書李銳講，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報告，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劉少奇最讓毛澤東恨之入骨的那句話就是：「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壓上書的。」

四川、河南、貴州、安徽、廣西等大饑荒重災區，尤其信陽、通渭、鳳陽、館陶、亳州、無為、羅定、濟寧等地，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有些全家都餓死了，不少村莊死得渺無人煙，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河南信陽地區死絕了5萬多戶，村莊毀滅1萬多個，僅光山縣就有5,647戶死絕。正應了那兩句毛詩：「千村癩瘠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文：沉靜

1959至1961年，一場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飢荒劫難降臨中國大陸：幾千萬中國人死於飢餓，各地上演著「人相食」的人倫慘劇。這場由中共一手製造的「人禍」，至今仍是大陸官方極力封鎖的歷史。

繼中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後，中國大陸饑殍遍野，出現長達三年之久的大飢荒。中共對外宣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而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天災、戰爭或瘟疫，完全因中共一系列浮誇、冒進的錯誤政策所致。

儘管中共極力抹去歷史的記憶，但有關大饑荒的細節與真相，被《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徹底曝光。往事不堪回首，更難以回首，作者楊繼繩卻努力挖掘出當年的一幕幕真相。他說，自己衝破重重阻力完成這部巨著，是為歷史正名，也是為了讓人們記住並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現年76歲的楊繼繩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2001年退休後，先後擔任《中國改革》等多家雜誌編委和顧問。2003年起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2015年被迫離任。他還多年兼任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境外大學多次作過訪問學者。



▲湖北麻城區建國一社早稻畝產36,900多斤，《人民日報》等登出照片並配說明：「孩子們站在上面就像站在軟綿綿的沙發上似的。」(資料圖片)

2 到底死多少人？

1961年底，糧食部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查一下到底餓死多少人，讓各省填報一個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匯總後，發現全國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送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人。周恩來看後通知：「不要外傳，立即銷毀！」於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及印刷版。幾天後，周恩來又問：「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連版也銷毀了。」楊繼繩零三年採訪周伯萍，他只講了經過，不肯吐露具體死亡數字。

為研究各省的死亡人數，楊繼繩下了很大功夫：向多位人口學家請教過，同他們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幾乎找齊中外人口學家對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的資料，研究他們的方法，分析他們的計算結果；還把分省的三十冊《中國人口》有關資料數據逐一抄錄，列成表格，再一個省一個省計算。每天下班後就計算，一個晚上只能算出一個省。他珍惜每一個數字後面從生到死的生命。他估算，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約3,600萬。

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透露，體改所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死於飢餓。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這個數字是5,000萬到6,000萬。曾在國務院辦公廳任職的曹思源說，大躍進(1958—1960年)期間全國餓死的人數已解密，是3,756萬。

1962年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進京告狀，四川大饑荒至少死了1,000多萬人。胡喬木給毛澤東的調查報告是湖南大饑荒期間死亡率嚴重的達20%左右。貴州省是餓死人比較多的省份之一。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推算，從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89.59萬，婦女閉經、子宮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萬。全國各地大小城市糧食供應不斷減少，一般市民吃不飽、營養不良的也很普遍，從中國的人口數據可以看出，1961年出生率最低。

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卻是全國1,600多萬人非正常死亡。水稻專家袁隆平說中國大饑荒「餓死了4,000萬—5,000萬人」。荷蘭學者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中，估計至少有4,500萬人死於非命，其中6%~8%死於暴力，是波爾布特紅色高棉時期死亡人數的20倍以上。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維志是學人口統計專業出身，當年曾在公安部搞人口統計，還到一些省搞過人口數字核對和調查，他的研究結果是3,546.6萬人。楊繼繩多次與王維志進行過探討，基本同意他的結論。楊繼繩說，他的3,600萬是保守數字，還沒包括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人。

3,600萬人是個甚麼概念？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相當於日本在中國南京大屠殺中殺害人口的120倍，遠超第一次世界大戰1,000多萬的死亡數字，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烈程度。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000萬人。)



▲1962年5月1日至28日，有6萬從大陸逃到香港的中國人被香港政府遣返。圖為難民將手伸出車外要食物。(AFP/Getty Images)



中共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超英趕美」為目標，發動了全國性的「大躍進」運動，最終爆發了大饑荒，數千萬中國民眾死亡。(資料圖片)

3 極權制度的墓碑

《墓碑》分為各地情況展現和綜合專題論述兩大部分。篇幅宏大，史料豐富，客觀寫實，嚴謹樸素。從禍起中原、甘肅不甘、安徽不安到天府之國的饑餓、魚米之鄉的餓殍，從燕趙悲歌、齊魯之難、黑色貴州到嶺南風雲的逃港狂潮、雲南邊民的大外逃……楊繼繩描繪的是全景立體的災難圖，有側面、有細節，有群像、也有個體和特寫，呈現了在沒有戰爭、沒有瘟疫、氣候正常的年景所發生的「共慘人禍」，觸目驚心，慘不忍「讀」。作者深刻全面地分析論述造成大饑荒的時代背景和制度成因，認為其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

蘇聯、中國、柬埔寨、朝鮮等共產國家(沒收私有土地，搞農業集體化)都曾發生過慘烈的大饑荒。而在任何一個民主、有新聞自由的國家，沒有發生如此嚴重的饑饉。極權制度是大饑荒的根本禍因。

楊繼繩指出：「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饑荒期間，近四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以後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極權制度比過去產鬆動了許多……但是，由於政治體制依舊，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更加劇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種矛盾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錯位……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極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一起，不斷製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著底層群眾的不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裡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

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墓碑》的出版正好填補了大陸史學界對三年大饑荒這段歷史的研究空白。「中國現代史學會」認為，這是迄今關於這場大饑荒最有價值、最有分量的著作，「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可信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

三年人禍，4,500萬冤魂，在中共的導演下變成延續半個世紀的謊言。這場災禍，不僅讓神州大地生靈塗炭，更在思想上禁錮並愚弄著今天的中國人，遺毒無窮。當歷史漸漸遠去，記憶漸漸模糊，一部正義敢言的著作猶如衝散迷霧的勁風，而中華民族的覺醒也將為中共體制豎一塊真正的「墓碑」。◇

中共殺人史

中共 1949 年建政以來，在和平時期造成八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超過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從殺 AB 團、延安整風、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大饑荒、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輪功，中共從 1921 年建黨之初到今天近百年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的歷史。

中共的殺人歷史

■ 記者戴安綜合報導

中國共產黨 1921 年成立，1949 年奪取中國政權。在其暴政統治下，約 8,000 萬人因為迫害、飢餓、槍殺或其它非正常原因死亡，這一數字超過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的歷史。



1953 年，新疆阜康，中共軍管人員槍殺「地主」和「反革命分子」。(National Archives)

1 殺 AB 團

AB 團是中國國民黨中的反共者於 1926 年 12 月在江西成立的一個團體，1927 年 4 月解散。1930 年下半年，中共在內部發動反 AB 團的肅反運動，大量殺害黨內工作人員。1930 年 12 月，中國工農紅軍紅二十軍在江西富田發動兵變，攻占了富田縣城，釋放所有被捕人員，逮捕了中共當地政府人員。3 月 28 日，中共最高領導人王明派出任弼時等人前往中央蘇區，宣布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暴動」。4 月 18 日，紅二十軍兵變的領導人在前去參加原定的談判時被逮捕，不久即被全部處決。7 月，紅二十軍被調至江

西平頭寨，被彭德懷和林彪率部包圍繳械，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及 700 餘名副排長以上軍官被集中到平安河壩上進行處決，「平頭寨殺人，整條河水都染紅了」。富田事變後，各地的反 AB 團運動掀起新高潮，審訊手法異常殘酷，「捆著雙手吊起，人身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內。」一時間江西蘇區人人自危，許多地區的中共機關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員都成了「AB 團分子」，共有 7 萬多人先後被殺。中共後來承認 AB 團並不存在，絕大多數被處決者都是無辜的。

2 延安整風

1942 至 1945 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整肅運動，採用了審幹、肅反等紅色恐怖和流氓手段，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絕對權威。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發動的「搶救運動」，直接導致了上千人死亡。其中最著名的受難者是知識分子王實味。王實味於 1937 年到達延安，在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翻譯了 200 多萬字的馬列著作。從 1942 年 2 月始，王實味響應毛的號召，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

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發表文章，描寫延安「新生活」的陰影，質疑中共的等級制度和官僚化趨向。王實味的文章是對毛思想的挑戰。他因此被定性為「反革命派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1943 年 4 月 1 日，康生下令將王實味正式逮捕。1947 年 7 月 1 日夜，在山西興縣，王實味被帶到黃河邊的一處偏僻山隅，被大砍刀砍死，屍體被扔進一口枯井。延安整風運動裡死了多少人，從沒有公布過。但是自此以後，再沒一個人敢對黨說「不了」。

3 長春圍困戰

1948 年 3 月 13 日，東北民主聯軍攻占四平，長春成爲被共軍重重包圍的一座孤島。1948 年 6 月 7 日，毛澤東正式同意對長春採取久困長圍的方案。當時提出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軍困死在城裡。」由於城中存糧只能維持到 7 月底，7 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長春守將、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要求從 8 月 1 日起疏散民衆。但是共軍的做法卻是「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圍城三個月後，9 月 9 日，林彪與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等聯名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以樹葉青草充飢，餓斃甚多。」

原吉林省政府參議兼駐長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憶說，共軍哨兵看到難民走近便說：「老鄉，不能再前進了，你們再前進，我們只好開槍了」。難民哀求道：「我們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這兒把我們餓死呢？」共軍回答是：「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們也不敢違背紀律。」有人不顧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槍就一命嗚呼了。1948 年 10 月 24 日，南京《中央日報》在《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說：「據最低估計，長春四週匪軍前線地裡，從 6 月末到 10 月初，四個月，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 15 萬具。」國民政府方面認爲，中共軍隊圍城期間的行為構成戰爭犯罪，共產黨應爲這一問題負責。

4 鎮反、土改

中共在 1950 年 3 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這個「千分之一」，就是鎮反期間中共定下的殺人指標。實際上，最後所殺的人數超過了這個比例。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鎮反運動一共殺、關（勞改）、管（群眾管制）各類反革命分子 300 萬左右。1996 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 1949 年初到 1952 年 2 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 157.61 萬多人，

其中 87.36 萬餘人被判死刑。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 100 萬到 200 萬之間，甚至更多。與「鎮反」同時轟轟烈烈展開的是「土地改革」運動。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九評共產黨》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土改時常常召開鬥爭會，把地主富農押上台，扣上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則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分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就被就地處決。據中共公布，到 1952 年底消滅「反革命分子」240 餘萬人，實際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 500 萬人。

5 「三反」「五反」

1951 年到 1952 年 10 月，中共開展了「三反」和「五反」運動。「三反」是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在「三反」運動中，處決了腐敗的中共幹部，但緊接著，中共認

爲幹部變壞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次年 1 月開始「五反」。「五反」實際上就是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寫：「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據 1996 年《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 32 萬 3,100 餘人被逮捕，280

餘人自殺或失蹤；在 1955 年「反胡風運動」中，有 5,000 餘人被牽連，500 餘人被逮捕，60 餘人自殺身亡，12 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 2 萬 1,300 餘人被判死刑，4,300 餘人自殺或失蹤。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 1948 年到 1955 年，有 400 萬人被處決。」

6 大饑荒

1958 至 1962 年，「大躍進」的浮誇風、強制的農業集體化以及公共食堂制度，導致一場大饑荒席捲中國大地。據前國家統計局長薛暮橋估計，1958 年大食堂過度消耗糧食達 1,750 萬噸。本來當年收

成不錯，可是僅僅半年之後就發生了饑荒。中共近年數據「解密」，承認在大饑荒中有 3,756 萬人被餓死。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數據是，大饑荒死亡人數爲 3,700 萬~4,300 萬。僅河南省信陽地區就餓死了 100 萬人，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史稱「信

陽事件」。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是餓死人的高峰期，三年餓死 3,000 萬人以上。但是，1959 年，中共卻出口糧食 415.75 萬噸。這麼多的糧食，除以 3,000 萬人，每人應可得到 138.6 公斤，一個人都不會餓死。1960 年中共還出口了 270 萬噸糧食。

7 文革之殺人狂潮

文革後葉劍英曾講話說：文革整了 1 億人，死了 2,000 萬。美國夏威夷大學拉梅爾（R.J. Rummel）教授在其著作《中國血色百年》（1991 年）中估算，大約有 773 萬人在文革中喪生。《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寫：「1984 年 5 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 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 萬 8,000 餘人非正常死亡；13 萬 5,000 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 23 萬 7,000 餘人，703 萬餘人傷殘；7 萬 1,200 餘個家庭整個被毀。」文革的第一波殺人潮始於 1966 年。當年 6 月，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宗旨下，抄家之風由北京的紅衛兵掀起，迅速波及全國。隨後，開始了拷打和殺戮「牛鬼蛇神」。1966 年 8 月，北京的紅衛兵在一個月內就殺死了 1,772 人。學者丁抒評說：「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棒皮帶。

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研究文革受難者歷史的學者王友琴在《恐怖的「紅八月」》中寫：「1966 年 8 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和北京第 31 中的書記杜光，都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去了火葬場。火葬場的工人發現他們還沒有死，沒有燒他們。他們又回了家。當時大量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1967 年 1 月 26 日，新疆「石河子事件」打響了全國武鬥的第一槍，也揭開了第二波殺人高峰的序幕。從當年 8 月開始，上海、南京、鄭州、長春、瀋陽、重慶和長沙等地相繼發生了大規模武鬥，至 1968 年底方漸平息。雲南軍隊圍剿名爲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20 分鐘後，數千名該組織成員全部斃命。估計死於武鬥的總人數約爲 30 萬至 50 萬。武鬥中，對戰俘的虐殺極爲殘忍。如河北雄縣由三十八軍支持的

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後全部槍殺。濫殺手段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活埋。1968 至 1969 年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資料顯示，全國兩千多個縣，每一個縣平均約有一百人死於「清隊」。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只有 110 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 41 人被揪鬥、致死致殘。此外，還有大批有識的各界人士因言獲罪、慘遭槍殺或死於獄中。除了被殘忍的殺害，文革初期有 10 萬至 20 萬人因爲不堪迫害而自殺。如此大範圍的自殺潮，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作家巴金會回憶說：大家都像跳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毛澤東會對李志綏醫生說：「這次怕又要有人自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

8 「六四」慘案

1989 年 6 月 4 日，中共政權血腥鎮壓了長達 50 多天的學生民主運動，震驚世界。至今，「六四」在中國仍是禁忌話題。有多少人死於「六四」屠殺，各界說法不一。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 4 時，中共中央決定清場，並宣布「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當晚，中共軍隊從城郊開進北京城。

晚上 10 時後，入城的軍隊開始向民衆開槍射擊，起初，廣場上的學生以爲軍人只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後來才知，軍隊動了真槍實彈。學運組織者王軍濤說：「你知道部隊只要一開槍，就直接往前打了，一路殺過去，死傷無數。我一看馬路邊上躺了一個人，腦子血流了一地，那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什麼叫死不瞑目，眼睛看著天呢。」天安門母親運動確認的死者清單從 1999 年提出的 155 人、2005

年的 187 人、2010 年的 195 人，到 2011 年 8 月共有 202 人獲得確認。評論作家曹長青曾撰文寫：「在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 400 到 800 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 400 人估算，也超過整個 19 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 3,000 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9 迫害法輪功

1999 年 7 月，中共江澤民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鎮壓，自此開始了近 18 年史無前例的人權迫害。江澤民利用整個國家機器，對法輪功學員實施了「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政策。截止到 2017 年 2 月 17 日，經明慧網民間途徑證實的，已知有 4,075 名法輪功學員被酷刑迫害致死。而遭活摘器官遇害的人數量更爲巨大。另有數百萬人被抓捕，數十萬人被非法勞教、判刑。由於中共拚命掩蓋真相，大部分迫害事實仍未曝光，實際死亡人數，難以確定。虐殺發生在看守所、勞教所、監獄、洗腦班和精神病院等地。在江澤民「打死算自殺」、「殺無赦」等密令的指使下，中共對不願放棄修煉的法輪功學員使用了上百種酷

刑，包括毒打、電刑、火刑、注射有毒藥物、開水燙、烙鐵烙、逼坐「老虎凳」、鐵椅子、強姦、輪姦、電棍插陰道、吊刑、鎊刑、槍擊、強制灌食等，造成大批法輪功學員死亡、傷殘。許多慘烈的案例內幕輾轉傳至海外，曝光了中共迫害集團的罪惡。陳湘睿（男，29 歲），湖南省衡陽市法輪功學員。2003 年 3 月 11 日晚，時任衡陽市公安局國安支隊隊長雷振中帶領警察將陳湘睿綁架到市公安局，警察對其大打出手，電棒、鐵錘、橡膠棍一齊上陣，當場把他打致顛骨骨折，顛內出血，五臟六腑全部打壞，腹腔內抽出 2500 毫升血，腦中樞神經致命損壞。陳湘睿於次日早上離世。2006 年 3 月，原遼寧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員工安妮，作爲第一名證人，向海外媒體曝光中共活摘法輪功

學員器官的罪惡。隨後，加拿大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前加拿大聯邦議員喬·喬高受邀對此進行獨立調查。兩人在 2006 年 7 月發布了一份含有 53 項證據的調查報告，確認了活摘指控，稱此罪行乃「這個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通過十年的細緻調查，獲得了大量的錄音和資料證據，證實：江氏犯罪集團與軍隊、政界、司法界、醫學界、貿易界、黑社會聯手，形成了大規模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殺人網，出售器官、活體實驗、販賣屍體牟取暴利。中共軍隊、武警醫療系統大規模涉入，達到了隨意攫取、殺人如麻的地步。據分析估計，被活摘器官殺害的法輪功學員數目巨大。由於中共焚屍滅跡，受害者無一生還，更多的真相和數據還無法獲悉。

10 結語

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權像中共那樣對自己的國民揮舞

屠刀，而且殺人手段極其殘忍，罄竹難書。從殺 AB 團、延安整風、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大饑荒、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輪功，中

共不斷炮製謊言，欺騙國內外民衆、企圖逃脫罪責。浸著鮮血的歷史，無比沉重，是文明的恥辱。還原真相，清算罪惡，給明天希望。◇



共產vs納粹

共產黨與納粹極為相似，而共產黨的邪惡遠過於納粹。納粹在戰爭時期致死2,500萬人，而共產主義在和平時期致死1億人。納粹的邪惡舉世皆知，誰願與之為伍，世人皆會唾棄之，而共產主義仍在迷惑世人。

共產主義遠比納粹邪惡

文：程曉容

20世紀的人類社會，見證了慘烈的戰爭和動盪。兩次世界大戰，分別奪走了1,700萬和7,000萬軍人及平民的生命。戰場交戰、屠殺、虐殺、疾病和饑荒等多種原因，令龐大數量的生命從地球上消逝，或驟然，或緩慢。

硝煙散去。紐堡審判之後，許多戰犯被送上絞架或入獄服刑，正義得到了伸張。世界似乎重回安定，慢慢地治癒劫後的創傷。七十多年來，對戰爭的反思、對納粹暴行的揭露和譴責從未停止。研究學者、文學家和藝術家們陸續推出了數以千計的書籍和大批影視作品，以不同的角度記錄黑暗的歷史。奧斯維辛集中營對外開放，以色列、

美國和德國柏林大屠殺紀念館的建立，曝光了種族滅絕的極端恐怖。陰森的囚室、鐵絲網，在時時提醒著人們：謹責罪惡，永不再犯。

今天，「納粹」一詞，早已惡名昭彰，成為邪惡和殘暴的代名詞。對於納粹主義的宣揚或認可，無論以任何形式出現，都會令人驚駭、不被接納。然而，就在陽光下，在所謂的和平時期，卻還有一種罪行，更為邪惡殘暴，仍然在肆虐橫行，且不斷變換面目。那些罪惡的製造者，那些殺人無數的暴君，居然繼續被尊崇和膜拜。邪惡的理論，還在通過教科書和各種宣傳媒介向億萬人灌輸著。殺戮，沒有停止；壓制，是極權的專利。對此，保持沉默、視若無睹，都是對生命和尊嚴的褻瀆，也是對昔日死難者的不敬。



▲ 共產黨和納粹的宣傳畫報極為相似。(資料圖片)



▲ 1930年蘇共逮捕所謂「富農」的場面。(資料圖片)



▲ 金邊境內克殺戮場(萬人塚)的一棵大樹。柬共暴徒用這棵樹將兒童活活活死。(Getty Images)

3 中共暴政

中共，曾給予了紅色高棉精神和物質上的最大支持。中共的手上，其實沾著柬埔寨受害民衆的鮮血。而中共在屠殺本國百姓方面，更是登峰造極，集罪惡之大成。

毛澤東說過：「與人鬥其樂無窮」，「8億人口不鬥行嗎？」1957年，毛澤東訪問蘇聯，在莫斯科的共產黨會議上公開講：「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

暴君酷愛鬥爭，令其無休止地發動政治運動，製造恐怖，將全民陷於「敵對鬥爭」和「消滅敵人」的血雨腥風中。時間、精力、國力，全部投入害人的鬥爭，而鬥爭又殘害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毀滅了文化、道德和信仰。

陳禮銘在《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中小結說：「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他們的敵人經過了土豪劣紳、國民黨反動派、托派、AB團、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地主富農、不法奸商、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蘇聯修正主義、高饒反黨集團、胡風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右派分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五一六分子、階級異己分子、

林彪反黨集團、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三種人、四人幫、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革命暴徒……西方反華勢力……直到現在乾脆簡化為『敵對勢力』四個字。」

從延安整風，到土地改革、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文革，再到「六四」，中共專制機器不停地揪出反黨分子，對他們侮辱折磨、剝奪一切權利，甚至大開殺戒。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被整肅的對象幾乎都是對黨和「領袖」忠心不二的人士，甚至包括諸多中共高層領導人。他們熱情地向中共提出意見和建議，卻在一夜之間被打成「特務」、「叛徒」、「內奸」、「反革命」。他們淪為政治賤民，或是被勞改、抓捕，被批鬥、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這些遭到中共瘋狂迫害的受難者來自社會各界，不僅有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十大元帥中的彭德懷、賀龍等人，也有大批科技、文化和藝術精英，還有正直善良的工人和知識分子。

濫殺，在中共的暴政下，持續不斷。文革期間，大陸曾發生過慘絕人寰的三大屠殺案。作家譚成專專門調查了道縣大屠殺，將調查報告集結成書——《血的神話》。這場屠殺始於1967年8月13日，主要是

針對地主、富農等「黑五類」及其子女。殺人手段五花八門，包括槍殺、刀殺、沉水、炸死、活埋、棍棒打死、繩勒、火燒、炸藥炸死等。

譚成專說，道縣屠殺並非文革時期的特例，它是基於中共傳統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理論。大陸前媒體人楊繼繩表示，道縣慘案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的屠殺。

據學者統計，在中共執政的68年當中，在歷次運動中被迫害致死、被逼自殺，或因其它原因非正常死亡的總人數高達8,000萬，僅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就有4,000多萬人餓死。這個數字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今日，在「人權最好時期」的幌子下，中共依然在堂而皇之地封鎖資訊、欺騙人民、迫害信託、殘害無辜。1999年7月，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群體的鎮壓，瘋狂迫害煉「真、善、忍」的好人。江澤民實施了滅絕政策——「經濟上截斷，名譽上摘臭，肉體上消滅」。江氏犯罪集團甚至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販賣牟利，這一罪行被稱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九評共產黨》說：「中共可以使人變成豺狼魔鬼，因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殘。」

2 共產黨破壞文化泯滅人性

納粹帝國推崇德意志文化，鼓吹日耳曼民族優越論，在此基礎上對異族實行殘酷的滅絕，但是在國內，德國的民衆享有較為優厚的福利待遇。而共產主義的更加邪惡之處在於，各國共產黨大肆屠殺的都是本族同胞，而且毫不留情地破壞本民族的文化遺產和傳統道德。例如：斯大林搗毀了莫斯科的數十座教堂，波爾波特拆除了金邊大教場，而中共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毀滅性破壞，則是無遠弗屆、空前絕後。

文革初期的「破四舊」運動，掃蕩了全中國城鄉的文物古蹟。以中學紅衛兵為主的「革命小將」殺向各地名勝，要破除一切古代和外來的文化。圓明園遺址再次遭到破壞，

建築基址和山形水系僅存輪廓。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的陵寢遭到永久性的毀滅。曲阜孔廟慘遭蹂躪，孔子墓被鏟平不挖掘，其內的孔子遺骸早已不知所終，「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毀。面積3,000餘畝、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被洗劫一空。在挖墳狂潮中，明太祖朱元璋、名相張居正、民族英雄袁崇煥、蒲松齡、康有為、張自忠上將等人的墓地，全都被破壞了。民間收藏的無數珍奇古董、古籍字畫都被抄走或付之一炬。此外，文革期間盛行的批鬥、抄家、告密等行爲，加劇了中國傳統道德的淪亡。有學者指出，十年文革對於中國文化的重創，幾代人都難以恢復。

共產主義顛倒善惡，以無神論取代人對神的敬畏。在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共產政權煽動仇恨，妖魔化被鬥爭的對象，鼓勵人們互相揭發告密，向黨靠攏，放棄本性的善與愛。就這樣，在共產的旗下，人性被扭曲，人變成了奴隸、機器甚至魔鬼。由此可見，共產主義對人民的精神異化，遠甚於納粹主義對民衆的洗腦宣傳。

共產黨政權對內實行欺騙和鎮壓，鐵腕維穩，對外則利用各種手段有步驟地輸出仇恨、進行滲透，企圖顛覆西方自由社會。嚴峻的現實已經表明，紅色的謊言、仇恨和恐怖已經延伸到了非共產黨執政的民主自由國家。

3 共產罪惡遠未被人認識

造訪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遊客，有多少人會想到，當年希特勒爲了滅絕猶太人，派出大批蓋世太太去蘇俄學習建造集中營的經驗。德國和德占區的幾百個猶太人集中營和戰俘集中營，就是參照「古拉格」的模式建成的。

共產主義暴政下的產物，給邪惡軸心提供了犯罪的靈感。

陳禮銘這樣對比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特點是製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專制、崇尚暴力、鎮壓異己、擴張勢力、鉗制輿論、壟斷經濟。而正是在這樣一些實質問題上，它們是同林之鳥一丘之貉。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法西斯主義者公然

反對民主，因而是明火執仗的強盜；而共產主義者則扯一塊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著羊皮的豺狼。」

《共產主義黑皮書》寫道：

「爲什麼對於跨八個年代在四大洲觸及約三分之一人類生命的共產主義巨難，學術界是如此震耳欲聾的沉寂？爲什麼人們對於把罪行——大規模犯罪、系統性犯罪以及反人類罪——這樣的關鍵因素作爲分析共產主義的中心因素有如此廣泛的遲疑？」

「至於列寧、毛澤東、胡志明甚至還有斯大林，則一直享受著令人驚訝的尊崇。法國國家樂透彩作爲一家政府機構，甚至瘋狂到把斯大林和毛澤東用於廣告促銷活

動。請問有誰膽敢出主意將希特勒或戈培爾用於商業廣告？」

歷史的悲劇，寫在昨天。嚴肅的思考，留給現在。警鐘，早已鳴響。對於一切曾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悲劇，對於將會實施、毀滅明天的罪惡，我們怎可坐視不理？

烏克蘭總統尤先科曾說：「共產邪惡就只能稱爲邪惡，不能叫別的，……共產主義極權需要的是絕對的權力。而對於這個絕對的權力，人就必須變成動物一樣，忘記道德，忘記靈魂，成爲非人類。」

人類，豈可成爲「非人」？遠離、唾棄、拋棄共產黨，告別夢魘，悲劇方可結束，世界才能回歸真正的文明和美好。◇

1 共產黨殺人遠多於納粹

納粹殘殺了600萬猶太人、330萬蘇聯戰俘、110萬死於集中營的被放逐者，以及數十萬吉卜賽人，加上戰場上的1,500萬致死人數，受害者總數約爲2,500萬。

和納粹相比，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屠殺了多少生靈？

根據《共產主義黑皮書》統計，在20世紀，全球共產主義革命的死難者，總計爲近1億人，其中蘇聯2,000萬，中國6,500萬，越南100萬，北朝鮮200萬，柬埔寨200萬，東歐100萬，拉丁美洲15萬，非洲170萬，阿富汗150萬，死於未掌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約1萬。許多學者認爲，以上數字要低於實際死亡人數，如中國至少有8,000萬人。

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共產主義的誕生。共產

20世紀遭共產政權迫害致死人數	
蘇聯	2,000萬
中國	8,000萬
朝鮮	200萬
柬埔寨	200萬
非洲	170萬
阿富汗	150萬
越南	100萬
東歐	100萬
拉丁美洲	15萬
總計	1億935萬

(大紀元製表)

主義起源於黑幫組織，實質信奉魔教。一個幽靈開始在歐洲和世界的其它地區飄蕩，散發最邪惡的毒害。

共產主義學說故意誇大不同階層人們的矛盾，主張階級消滅論，宣揚暴力階級鬥爭。馬克思本人因而被指爲「現代政治種族滅絕的祖先」。馬克思曾經寫道：「如果階級和種族太過脆弱，不具備適應新的生活條件，必須讓路，他們必將被『革命的大屠殺所消滅』。」

1 蘇共暴行

1917年，蘇俄共產黨奪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黨政權，將馬克思主義付諸實踐，同時開啓了共產暴政的殺人史。

前蘇聯異見人士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說：「共產黨執政後，無論在俄羅斯、波蘭、古巴、尼加拉瓜或是中國，他們首先要消滅本國約十分之一的人口，目的是『重建社會結構』。」然後，共產黨便開始消滅某些特定群體，在蘇聯，這些人包括神父、農民、知識分子、商人和某些少數民族，例如烏克蘭人、車臣人、猶太人等。

列寧掌權後便實行恐怖統治，僅僅從1918年到1922年2月，殺人不少於200萬。列寧曾經說過：「在每十個犯有怠工罪的人當中就地槍決一個。」「至少逮捕100名富農，公開處決這些人質，把屍體掛在那裡，讓周圍幾百英里之內的人看到並且發抖。」

斯大林上台後，開始了令人談

之色變的大清洗。從政府到軍隊，一半以上的黨員被逮捕、清洗，軍隊高級將領從元帥、一級集團軍將領、二級集團軍將領到軍長、師長，每級軍官被槍斃的比例都超過百分之六十，甚至達到百分之百。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還發生了人爲造成的大饑荒，餓死了800多萬人。

1930年，蘇聯建立了「古拉格」，即蘇聯「勞改營管理總局」。在斯大林去世前，全蘇聯共有勞改營170所，遍佈各個地區和角落。據統計，在1930年至1940年間，由於條件極端惡劣、勞動強度過大、飢餓和遭受非人待遇等原因，有50多萬名勞改犯死亡，包括許多詩人、作家、學者、科學家 and 藝術家。蘇聯勞改營後來成爲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勞改營的樣板，希特勒甚至派出蓋世太太去蘇聯參觀、學習建造勞改營的經驗。

據蘇聯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於斯大林暴政的人數約爲2,000萬。

2 赤棉大屠殺

提起「紅色高棉」，人們便想到白骨累累的「萬人坑」和「殺戮場」。

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戰勝美軍支持的柬埔寨共和軍後，開始了一場歷時近四年的種族滅絕共產主義革命。紅色高棉首先展開了人類史上罕有的逼遷行動，以槍械威逼，撤空了人口達200萬的金邊，年老體弱及年幼居民的屍體被棄在路邊。

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Pol Pot)的統治讓國家回到「零年代」，文明降至歷史最低點。在三年八個多月的時間裡，柬埔寨有近200萬人被殺害，或因飢餓、過度勞累而死亡，占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開放給遊客的一個殺戮場前，導遊介紹說，紅色高棉爲節省子彈，

殺人多用棍棒重擊或以斧頭砍殺。最殘忍的是殺死兒童時，暴徒們倒拎著小孩的雙腳，對著大樹將他們的頭部用力砸去，活活將其撞死。至今，還能看到有的大樹上嵌著小孩的牙齒。婦女則在死前遭強暴，然後被蒙上雙眼，一絲不掛地被重棍擊斃。

2015年4月17日，在內戰結束四十周年紀念日之際，倖存者胡霍(Huot Huorn)對記者說：「四十年前，波爾布特把柬埔寨變成了一個地獄、一個鬼地。」她爲36名死去的親友上香，她表示：「我仍然很憎恨這個政府……它們的罪孽仍然清晰地在我眼中。他們讓我們挨餓、不給被監禁的人們吃喝，直至他們餓死……我看見他們把孩子的頭砸向樹。」

退出中共

歷史走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中共的列車正急速駛向懸崖，許多人因為留戀中共狼窟裡的榮耀而忘記了危險。

到2017年2月底，超過2.6億中國人通過各種渠道在大紀元退黨網站上宣布退出中共黨、團、隊。

大紀元鄭重聲明

廣大的中國民眾：共產黨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這個邪惡的黨（魔教）在歷史上卻對眾生、對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這個惡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類的誰對共產黨清算時，也一定不會放過那些所謂堅定的邪惡黨徒。我們鄭重聲明：所有參加過共產黨與共產黨其它組織的（被邪惡打上獸的印記的）人，趕快退出，抹去邪惡的印記。一旦誰對這個魔教清算時，大紀元儲存的記錄可以為聲明退出共產黨和共產黨其他組織的人作證。

天網恢恢，善惡分明；苦海有邊，生死一念。曾被歷史上最邪惡的魔教所欺騙的人，曾被邪惡打上獸的印記的人，請抓住這稍縱即逝的良機！

大紀元
2005年1月12日

《九評共產黨》目錄

- 【一】評共產黨是什麼
- 【二】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
- 【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
- 【四】評共產黨是反宇宙的力量
- 【五】評江澤民與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
- 【六】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
- 【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 【八】評中國共產黨的邪教本質
- 【九】評中國共產黨的流氓本性

《九評共產黨》引發中國退黨大潮，被譽為救世奇書。
《九評共產黨》多語種免費下載：
www.epochtimes.com/gb/4/12/13/n746020.htm
或聯繫益群書店購買：
www.yihchyun.com.tw/z111.htm



免費「翻牆」軟件

- 1. 鏈接**
自由門專業版：
<https://git.io/fgp>
自由門安卓版：
<https://git.io/fgma>
- 2. 破網軟件索取信箱**
使用海外信箱寄一封信（主題不可空白）到以下郵址：
freeget.one@gmail.com
約十分鐘就可收到自由門下載點。
- 3. Skype**
動態網的Skype帳號 dongtaiwang.com 提供隨時更新動態網IP地址和下載自由門最新軟件服務。Skype一定要到官方網站 www.skype.com/zh-Hans/ 下載。註冊後，到「聯繫人」點選「添加聯繫人」，然後在「Skype用戶名」框中輸入「dongtaiwang.com」，看到「動態網的Skype版」後點擊「添加」，即會出現在主界面的聯繫人中，向他發送任意訊息，會得到有關指示。◇

退黨退團退隊方法

可使用真名、化名、小名三退，聲明最終需要遞達到大紀元退黨網站。
用海外郵箱發三退聲明給 tuidang@epochtimes.com
用破網軟件登錄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可先將聲明張貼在適當的公共場所，以後再上網。

美國三退熱線電話

001-888-892-8757
001-866-697-6570
001-702-873-1734

加拿大三退熱線電話

001-604-276-2569
001-514-342-1023
001-416-361-9895

三退傳真

001-301-916-2364
001-201-625-6301
001-510-372-0176

【大紀元編輯部特稿】

感情代替不了理智

1921年，西來的「共產主義幽靈」侵入中國，一群躁進的知識分子建立了共產黨，從此引狼入室。共產黨在中國歷次運動中殺戮文化精英，在文化大革命中毀滅中國的文

物和歷史，批判中華民族的祖先、聖賢、英雄、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五千年文明被踐踏得一錢不值，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黨文化。

現在的中國人在這樣的文化中

長大，很多人是非善惡完全被混淆，以在邪惡的環境中求得一時風光、一點甜頭為榮耀，作為人一生中值得留戀的東西。他們用感情取代理智，忘卻了這一代中國人的恥辱，

看不到中國傳統文化各個歷史時期和自由社會正常人生中的真正榮耀。作為中華民族的子孫，不要用感情留戀狼窟裡的榮耀，去除中共惡棍才是我們的責任。

1 歷次運動都殺戮文化精英



▲文革中拉薩大昭寺被破壞之後，貴金屬被收集起來運出西藏。（資料圖片）

右運動和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查對中共的官方資料，反右運動中，中國一半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成為底層賤民，遭受迫害。

文革中對文化精英的迫害更是觸目驚心。因不堪凌辱、酷刑、恐懼而自殺的文化名人數不勝數。著名作家老舍跳北京太平湖自殺；著名翻譯家傅雷服毒自殺，其妻子隨

之上吊；國學家熊十力絕食身亡；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服安眠藥死於醫院；著名女電影演員上官雲珠跳樓身亡；歷史學家、北大副校長翦伯贊與妻子服安眠藥自殺；《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服毒而死……

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既是對中國文化精英的肉體摧殘、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空前毀壞，更是對國民精神的摧殘、對倫理道德的顛倒。知識分子被打折了脊梁，大多數人沉默了，跪下

2 輝煌文明被踐踏得一錢不值



◀1966年11月，紅衛兵砸毀山東曲阜孔廟，縱火焚燒匾額。（資料圖片）

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但黃帝陵遭到永久性的毀滅。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造字者倉頡的墓園被毀；山西舜帝陵被毀；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斷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

儒家始祖孔子被中共肆意批判和侮辱，墳墓被剝平、挖掘，孔廟中的泥胎塑像被搗毀。世界佛教第一至寶、佛祖釋尊在世時親自開光的三聖像之一——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全國最大的道教聖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觀被毀。

3 狼窟裡的榮耀不值得留戀

共產主義引入中國後，曾經以民族「救亡圖存」和建立「人間天堂」欺騙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如今很多人一生都生長在黨文化的環境下，取得了一些財富、地位和成就，讓他們感到自豪與留戀。

但是，仔細審視這一切，這種榮耀值得留戀嗎？今天的中國，環境惡化，道德淪喪，誠信缺失，為人師表者強姦幼女，為人學生者弑殺恩師，老人跌倒無人敢攙扶，官員貪污腐敗，擁有二奶、三奶、四奶……身在其中猶如身在狼窟，與中國過去路不拾遺、民風淳樸的盛世天朝有天壤之別。

中共1949年建政，它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謊言，讓受矚目的中國人自我感覺不錯。有人以「打江山」為榮，有人因為手中的權位不可自拔，有人表面上不承認與中共為伍，潛意識中卻留戀中共所給的好處。可是，一旦中共倒台，回過頭來，其中的一切都不值得懷念，那是一段黑暗的歷史。

中共計劃經濟崩潰之後開始搞「改革開放」，在中國融入世界後，經濟開始發展，生活水平提高。但這並不是甚麼值得誇讚的事。假如不是中共，任何一個正常的政黨執政，中國人的勤勞智慧加上中國的資源，中國經濟會比現在發展得快得多、好得多。沒有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八千萬非正常死亡，老百姓會安居樂業，會富裕得多。

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屈原的「上下求索」、岳飛的「精忠報國」、諸葛亮的「鞠躬盡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還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在自由社會裡，也有那些為自由人權價值而努力的仁人志士，受人尊敬。今天有誰會以在納粹中的地位而名望而自豪？有誰會以獨裁者斯大林給的榮譽而自豪？看看戈培爾、希姆萊、雅戈達、葉若夫等的下場就知道了。

在中共邪惡的環境中求得一時風光、一點甜頭，作為榮耀、作為人一生中值得留戀的東西，這和真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歷史各個時期相比、與自由社會正常理念相比，一個是狼窟裡得到的一點榮耀，一個是真正人生中所得到的榮耀，根本不是一回事。不要留戀狼窟裡得到的榮耀！那是這一代中國人的恥辱，是在引狼入室、與狼共舞，甚至是助紂為虐。

中國歷代有「易代修史」的傳統。二十四史記載著中華文明的榮辱興衰，像明鏡一樣照著歷朝歷代的善惡美醜，大善大奸均難遁其形。等中共滅亡之時，翻開那段歷史所記載的紅朝，狼窟裡的榮耀將成為罪惡的見證。

再看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倒塌的列寧像見證著它的邪惡，《共產主義黑皮書》記載著它的恥辱，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訴說著它的苦難，狼窟裡的榮耀可能是千古罵名！

4 中華兒女的責任：去除中共惡棍

如果把中華民族比作母親，那麼中共就是欺凌我們母親的惡棍。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去除這個惡棍才是理智的抉擇，才是我們真正要做的。沒有中共，中國會真正繁榮富強，自由昌盛。在歷史上，沒有中共的中國，歷朝都會是世界強國。

黑暗終將離去，巨變正在發生。中共的滅亡就像衝向懸崖的列車，無可避免。令人憂心的是其中無數個體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未來。用理智代替感情，冷靜地思考中國種種危機的體制根源，清醒地看到中共的危害，趕快跳下「死亡列車」吧。如何跳車？在大紀元退黨網站上聲明退黨、退團、退隊（三退），就是最好的辦法，真心動這一念，化名也有效。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拋棄共產黨，恢復中華民族的榮耀，是每一位中華兒女的責任。◇